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 (甘) LK000046

教学参考

JIAO XUE CAN KAO

- 制度视角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基本内涵与关键要素
-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 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
-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新阶段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主办

3
2021

教学参考

2021年第3期

(总第689期)

2021年6月25日编印

主 编 杨文福

副 主 编 鲜 鹏

高继明

责任编辑 张雅丽

发送范围

党校(行政学院)系统

Contents

目 录

◎党建研究

制度视角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基本内涵与关键要素 丁辉侠(1)

◎政治学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唐晓强(8)

◎经济论坛

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 刘伟等(18)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路径 陈晓东(26)

加入WTO20年:中国与WTO互动关系的演进 屠新泉等(30)

◎国企改革

论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必须正确认识的几个基本问题

简新华(38)

◎社会学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新阶段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都 阳(43)

◎热点追踪

全球供应链的演变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 朱晓乐等(46)

◎他山之石

从国家本位到市场化:德国公共服务的发展与启示 杨 炼(51)

◎新书推介

(56)

◎刊中报

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及其现实启示等7则 (28)

制度视角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 基本内涵与关键要素

丁辉侠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的历史是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与时俱进开展自我革命的历史,也是党内制度及其治国理政制度从构建、发展到不断完善的历史。制度对一个组织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从功能角度强调制度是一个人为设计的社会博弈规则,虽然限制了人们的行为集合,但通过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现有研究成果也基本上是沿着制度作为博弈规则的功能路径而探究其建立、发展与变迁过程的。而组织领导力研究发现了制度的另一项功能,即制度不仅具有约束力,还具有领导力,即把组织的目标和核心价值观融入组织的各项制度,然后用制度约束与规范个人与组织的行为,从而引导组织以较小的代价朝着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向发展。制度具有领导力的视角打开了理解那些长期具有生命力组织的另一扇窗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强大领导力的自信宣扬,也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持续提升提出的新要求。其实,“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源于成立之初便具备科学性和强大的领导力”。其中,制度方面的领导力是

中国共产党的关键领导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但制度视角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如何从历史视角理解中国共产党制度层面的领导力?

二、制度视角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基本内涵

“制度是嵌入组织价值观的东西”。制度之所以具有领导力,就是因为其嵌入组织目标和核心价值观,从而产生对个人和组织规范、引导作用。制度视角下的领导力是组织层面的领导能力,而不是组织中某个人的领导能力。但并非所有组织的制度都具有领导力,只有那些具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和战略目标,并把这些价值理念和战略目标融入组织的基本制度,由主要领导者带头遵循这些制度的组织,其制度才具有领导力。制度层面的领导力既包括制度的制定能力,也包括制度的执行与落实能力。无论是制度的制定还是制度的执行与落实,组织中的主要领导者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制度领导力虽然强调组织层面的领导力,但并不否定和弱化主要领导者的作用。制度变迁是组织领导力永葆青春的重要法宝,其中,领导者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关键作用。可以说,作为组织层面的领导力,制度领导力主要探索领导者如何通过组织

制度影响组织,以及组织如何通过制度引领组织发展的问题。

制度领导力可以减少个体领导力因领导者的更换而产生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并且能够维持组织持续稳定发展。无疑,制度具有领导力是一个组织维持持久生命力的重要保障。根据领导力的基本要义,本研究把制度视角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界定为,把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战略目标植根于党内制度和党的治国理政制度,并通过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把这些制度予以落实,在实现党的战略目标中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能力。

首先,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直接主体是党内制度与党的治国理政制度。一个有理想的组织在建立之后,必然以制度的形式明确组织的基本价值与战略目标,并以制度约束组织及其所有成员的行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领导力的制度包括两大方面:党内制度和党的治国理政制度。党内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基石,包括党内法规、党的规章和其他各项制度。党的治国理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重要体现。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制度体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和军事制度等方面。就微观方面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制度体现在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扶贫制度、环境保障制度等各个具体领域。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具有领导力绝不是说领导者不重要。相反,制度要在组织中发挥作用,领导者对组织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对制度的遵守以及监督制度的执行等行为至关重要。为此,只有卓越的个体领导力与制度领导力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才会更好地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

其次,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作用对象包括党组织、党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党组织和

党员是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力的制度规范的首要对象。只有党组织和党员严格执行党内制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同时,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领导力并不仅仅体现为党内制度对党组织和党员的领导力,还体现为通过党的治国理政制度对其领导下的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领导力。因此,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作用对象。一般而言,党内制度和党的治国理政制度质量越高,党内成员就越团结;其领导下的政府效能越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也就越信任、支持。然而,虽然党员、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作用对象,但不同对象在影响制度变迁方面与领导力绩效方面又存在着明显差别。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制度变迁的源动力。要了解并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并把这些需求制度化,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始终关注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并在制度实施过程中进行有效监管和落实。

再次,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目标是在实现党的最终目标的同时,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与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进行有机结合,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感知,生动诠释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只有根据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对党的最终目标和战略目标进行有效分解,才能在实现中短期目标的同时,高质量地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都有明确的组织和发展目标,各

个时期的制度才具有针对性和导向性。同时，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各项制度都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才更容易使制度得到认同，使制度领导力维持持久的生命力。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效果是由制度构建与执行的质量决定的。制度构建的质量是制度具有领导力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好的制度必须在充分考虑组织内外环境、主要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制度实施的影响等相关因素的基础上被制定。一般而言，“制度的公信力、影响力和约束力越强，制度领导力也就越强”。制度领导力的关键在于执行。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就不能有效地引导人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个别领导者的意志和潜规则就成为组织行为的真正规则。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可以说，制度领导力是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在实践中的最直接体现，也是衡量其执政效能的重要标准。因此，制度发挥领导力作用的关键还在于制定好的制度并让该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三、制度视角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关键要素

（一）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价值主线

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领导力的作用，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把组织的核心价值观融入组织的各项制度，从而对组织的发展和组织成员的行为产生价值引领与行为规范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最高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能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坚

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价值型组织”。人民群众是该组织的力量源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和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在革命斗争中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1944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再次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最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制度形式写入1956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此后，历届中央领导人也都在坚持与维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主线，并在各个时期的国家治理制度中予以强化。邓小平主张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等标准来检验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效果。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习近平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时刻把群众的困难和诉求记在心里，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为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完善与创新，在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对国家治理的领导作用。

总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遵循的基本价值主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这一初心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把这一根本宗旨融入党的基本制度和治国理政制度,在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共同坚持和努力下,党的制度层面的领导力才得以形成并持续地发挥领导作用。

(二)党的战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前进方向

具有吸引力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组织能够发挥领导力作用的重要条件,而战略目标的制度化则使组织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并且这一方向不会因个别领导的更换而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由于这一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将其分解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成为制度领导者的重要工作。于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于这一目标,毛泽东于1948年强调,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为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中共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于1953年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中共中央制定的“五年计划”(自2006年“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各个时期战略目标实现的基本制度框架。

在科学判断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并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三步走”战略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17年,党的十九大在即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时,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两个具体的阶段性目标:“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阶段性目标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及其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分解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成为政府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奋斗目标都是紧紧围绕“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目标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又敢于正确面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党情、国情以及国际环境,阶段性地提出各个时期的奋斗目标,并把这些目标以党的路线方针的形式进行制度化。同时,为实现这些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通过建章立制的形式,将其体现在国家“五年规划”、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以及各个领域的制度规范之中。连续的制度,让这些奋斗目标不会因为党和政府各级领导人的调整而中断,从而保障了党的战略目标得以一步一步的实现。可以说,明确、具有吸引力,又在实践上可行的阶段性目标,既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

在各个领域维持制度领导力持续稳定发展的公开秘密。

(三)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者是制度领导力发展演变的主要力量

领导者是组织规范与价值的重要传播者和保护者,也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主要领导者在制度创建与变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制度领导力不仅不回避领导者在制度创建中的作用,而且特别强调制度创建、完善与变革的关键在于主要领导者的支持和推动,从而使制度能够适应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在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增强制度领导力。领导者的制度工作就是个人或组织有目的地创造、维持和改变制度的行为。领导者通过创造、更新、完善、终止组织制度,引导组织在制度的规范下做出有利于组织发展的决策。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实施。集体领导在党和国家重要制度决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但在各个阶段,党和政府的各级主要领导者又在重要制度的创建、执行与完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制度领导力的核心人物。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和党情的制度与方针,如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为了落实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同时,在革命实践中严守党的纪律,从而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真正统一起来,最终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了新中国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通过制度引领各领域的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在制度维持与更新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与障碍,此时仍然需要主要领导者进行制度纠错与调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同时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不仅仅是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更是在强调制度的领导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如把改革开放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使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开始迈向“强起来”的道路。新时代,习近平更加重视制度建设的作用,在强调基本制度自信的同时,要求加强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2017年6月,《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制度治党的明确目标:“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作为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

好的制度只有通过落实,才能真正发挥其领导力。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方面,除了中央领导集体,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主要领导者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践中,除了党内制度需要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把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通过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具体化为党在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制度,然后由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把这些制度进行细化落实,让制度成为领导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工具。同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工作落实制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当这些制度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和意义时,党中央亦会把这些制度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从而使这些制度产生普遍的领导力,极大地发挥其领导效能。

总之,制度价值需要被组织的主要领导者遵守与维护,当主要领导者有动机和意愿去支持制度时,制度才能稳定,否则,制度就会被侵蚀,制度领导力也难以维持。可以说,正是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主要领导者带头遵守制度、维护制度,中国才能在维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成功推动经济、社会各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变迁,让制度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地方发挥作用,为基本发展方向提供明确的指引,推动中国一步一步地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

(四)制度调整与变革是制度领导力保持活力的基本源泉

制度的出现和维持是因为其在团结组织成员、解决组织问题、引导组织战略目标实现方面具有显著效力。当组织环境发生变化时,其内部就会产生改变旧制度、创建新制度的变革需求。制度调整与变革都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形式。在实践中,制度调整与变革的发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压力背景下,组织地位或生存受到威胁,制度领导者会带领组织有意识地创建新制度或者对原有制度进行适当调整与完善;另一种是组织并没有受到内外压力,而是制度领导者根据组织长期发展的需要,在对组织内外环境变化判断的基础上,对相关制度进行渐进式调整。一个目标明确

的组织,势必会在追求自身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逐渐改变制度结构。

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彰显制度优势,由于没有经验可循,因此,还需要在具体制度领域进行探索。制度也存在竞争,具有领导力并且能够使组织成员福利改善的制度才能成为具有持续领导力的制度。这也意味着,组织要维持制度的持续领导力,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为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由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具体制度的认知存在一个过程,因此,也会出现相关制度创建滞后、制度调整不及时等问题。正是认识到制度的这一特性,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制度和党的治国理政制度也随着国内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与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可以说,制度变革在各个领域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对于制度变革的重要性,1958年9月5日,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情况,毛泽东指出:“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进行制度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邓小平提出,在坚持“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原则下,“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此后,邓小平又提出检验党和国家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三条标准:“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当然,如果达不到这些标准,就意味着制度需要变革。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制度变革所遵循的基本标准。

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被确定之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重要制度变迁的道路。以经济领域为例,面对经济制度被破坏、生产活力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倒退的现状,中共中央决定进行经济制度改革,从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迅速瓦解原有的经济体制,而是在改革初期采用“计划为主、市场为辅”,逐渐引入市场经济制度的策略,“既减小了改革阻力,又将改革成本降低到最低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知推动了这场制度变革,并不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由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同样,在扶贫领域,虽然没有显著的外部压力,但为提高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贫困特点、对扶贫工作的需求以及国家阶段性发展目标,不断调整扶贫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瞄准制度、20世纪90年代的县域瞄准制度、21世纪初的村级瞄准制度到精准扶贫时期的贫困户瞄准制度,推动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降至2019年末的0.6%,为世界反贫困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不可否认,中国在扶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制度领导力在该领域的生动实践。

制度要在组织中维持稳定的价值引领与行为引导作用,就必须根据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整,因此,制度变革成为保持制度领导活力的重要途径。作为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目标与核心价值观决定了无论是党内制度还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制度,只要出现不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改善福利的情况,制度变革必然提上日程。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领导力才能在10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久不衰,在不同时期都始终散发稳定的领导活力。

四、结语

制度视角下的领导力强调把组织的核心价值融入组织的基本制度,并让制度成为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基本准则,从而避免因组织主要领导者的更换和调整而带来对组织发展的巨大冲击。制度领导力的现有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回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所有工作,虽然每个时期的工作目标与重点不同,但制度工作始终是党的重要工作。制度是加强党内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

虽然在不同时期,党内制度与国家治理制度存在不同的问题,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因制度质量不高、执行不力等原因没有全力助推国家发展,但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强大的制度校正能力,通过制度变革回归制度领导本质。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领导力时时刻刻都在面临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如何不断地完善制度,维持制度方面的稳定领导力,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其领导下的政府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虽然界定了制度视角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基本内涵及其关键要素,但对制度领导力的发展演变过程,制度领导力在新时代所面临的具体挑战,制度领导力发展的动力、方向,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具体领域的问题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这也是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摘自《中国共产党》2021年第5期)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丁辉侠,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导。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康晓强

一、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两个关键词

(一)制度: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一种交往形态以及由此所形构的独特的交往结构、规则结构、规范结构

关于制度议题的研究,政治学、社会学中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形成了深远的研究文脉。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雅典政制》,不管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抑或洛克的《政府论》,无不致力于探讨人类理想的国家制度的起源、本质、结构、形态、机理、演展、嬗变、建构、路径等基本问题。对其他社会科学而言,制度亦是一个核心且关键的研究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研究复兴,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关键词,并逐渐生成以制度为基本概念、分析单元来阐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象的学术流派、理论旨趣、剖析范式、研究取向的新制度主义。然而吊诡的是,关于制度本身的界定,不仅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者解说图式不同,甚至同一个学者基于研究对象、分析语境的差别也会有差异化的界定结构,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制度概念结构、理论脉络、诠释取向以及由此衍生的林林总总的学术形态。不少著名学者,比如韦伯、亨廷顿、罗尔斯等从各自学科视角对制度进行了简明精辟的界说;专研制度问题的新制度主义学者,如舒尔茨、拉坦、诺思、奥斯特罗姆、杰普森等对此也做出了相关类似的界定。

这些学者认为,制度是一系列影响人类行为的规制、规则、规矩、规范,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种有效实现机制,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从而为规范公民的行为提供基本的框架结构,避免“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集体行动困境。

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制度的界说,丰富了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广度和理解深度,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对制度的把握限于微观的维度、局部的层面,没有从广阔的视野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域予以审视,因此常常导致只见制度不见人、过于重视静态制度结构而忽视动态制度运行的内在欠缺。相比之下,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和见解尤其深刻,其主要贡献有二:其一,把现实的个人确立为制度的主体,摆正了制度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认为制度的实质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因此,制度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交往形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特有的交往结构、规则结构、规范结构。由此,人与人交往的制度化促使社会中分化的个体得以重新组织与再组织起来,促使碎片化的社会体系得以重新生产与再生产起来,促使零散化的自组织得以整合成有机的社会组织结构。离开人这个现实主体,离开人与人的交往实践这个基本平台和中介,制度就不可能生成,即使生成也难以有效运行、有序运转。其二,从宏观层面对制度的类型、样态予以界分。与新制度

主义等从微观行为视角研究制度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更多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思考制度的起源、演变、形态、功能等一般理论层面的问题,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用“社会制度”这个概念对制度进行界定。他们关于制度的精辟见解,深刻把握了制度的内在结构、本质属性、功能形态及运行规律,为揭示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崭新的研判视角、宽广的分析视域、高远的观察视界。

(二)本质特征:从肯定、正向的维度对事物内在属性的恒定反映

所谓本质,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可见,本质是事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是其自身的内在依据,是其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特性、特质。然而,对于事物的本质,人们通过对现象的感性认识往往难以深入内里的深层维度。因而,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往往是从外在的表象入手,逐步深入本质的外围界面,逐次递进,愈益深化,进而深度发掘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事物的本质较固定且单一,而其现象往往杂乱、无序、混沌、零散,因此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高度凝练、归纳、整理、爬梳,使其呈现一定的特征。事物的特征可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观察和剖析,因而呈现出多侧面、多层面、多样态的表征,体现为诸多子特征构成的特征群。大体而言,可把事物的特征区分为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两个方面。本质特征,是一事物与他事物在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差别、属性,是从肯定的、正向的维度对事物性质的恒定反映,因而对判定、辨识事物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根本性的作用。非本质特征,是对事物在某个地点、某个阶段、某种条件下发展状态的映像,是从次要的、偶然的有时甚至是否定的、反向的维度对事物本质的歪曲反映,并不体现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内在规定性。无论是本质特征,抑或是非本质特征,都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反映,但

两者在反映的性质、面向、程度等方面存在深刻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本质特征和事物的本质具有直接同一性,而非本质特征则与事物的本质不直接同一。本质特征如实反映事物的本质、存在状态、发展趋向,非本质特征既可能如实亦可能扭曲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其二,本质特征较为恒定、平稳,而非本质特征则变动不居、变幻莫测,常会根据外在环境、时代格局、历史情势等的变化而变化。其三,本质特征与非本质特征相比,能更真实、真切地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因此,对事物诸多特征的把握,关键要把握其中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主要表现

(一)方向层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结构”实现对一切工作的有效领导

任何制度的发育与生长都有其方向,中国制度也不例外,其发展方向就是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优化中国制度。如果把中国制度比作一座大厦的话,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就是“四梁八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统领地位”。这种统领地位如同丹尼尔·贝尔所谓的“中轴结构”所处的位置。在他看来,从经验层面而言,事实规程是第一位的,而从意义层面而言,逻辑规程则是第一位的。逻辑规程在思想形态上表现为由一系列概念或图谱构成的概念性图式。概念性图式以中轴原理为基础,具有一定的中轴结构,其价值主要有二:一方面,使人们对社会变革的分析采取多维度而非单向度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不摒弃在特定主题下理解关键结构中的首要逻辑,由首要逻辑推导出其他相关的次要逻辑。

据目前接触到的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献,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论断的是习近平在2013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所以把党的领导视为中国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主

要依据有四：

第一，共产党的领导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独特属性。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通过执政供给有效的政治秩序、实现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当家做主的地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坚持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会巩固；什么时候忽视甚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会衰败甚至走向灭亡。苏联模式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成就，为巩固处于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发挥了积极的效应，其根本经验就是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党集聚资源、高效办事等优势来服务国家、造福人民，“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很多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改名换姓、改旗易帜，共产党改成了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改变了党的性质、纲领、目标、组织原则、政治地位，改革变成了改向、变革变成了变色，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全面否定、渐次取消了，最后落得政权垮台、社会动荡、人民遭殃的厄运。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制度的本根。事物的本根从根本上体现了一事物的本质属性。坚守住并坚守好事物的本根，其他问题自然而然会迎刃而解。守不住、没守好甚或放弃本根，事物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无源的死水，必将丧失持续生长的活力、动力。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制度体系中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制度。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制度的各要素才能既有不同分工又有协同耦合，中国制度体系的整体性才能得以合理建构、有效形塑，才能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等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不良现象。有鉴于此，2018年2月28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

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是推进改革最核心的目的，偏离此就会南辕北辙而犯方向性错误。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现代化的实践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其基本前提是要有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独特的中国国情、民情、历史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如果盲目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现成模式必定会走向失败的厄运。有的后发国家生搬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而导致党争纷起、内乱频发、秩序失控等“民主之殇”，这是前车之鉴。同样一种制度，由于生长的制度环境不同，其效能就有殊异，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力量，而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成长供给有效的政治秩序、持续的政治愿景、一体化的政治权力结构。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社会必将出现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群龙无首的社会乱局，可预期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必然被打断。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应对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中国的抗疫行动赢得了新加坡一民调调查的全球最高分。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对国家治理结构体系的全面、深度嵌入。弗朗西斯·福山称：“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句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主导价值，但忽视了强大国家背后的强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作用。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活动中所建构的各种制度安排集中嵌入各项国家制度之中。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阐明中国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明晰了它们之间具有同源性、同根性，同宗同祖。关于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中心定位，习近平曾用三

个比喻予以形象形容:一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二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作一座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支撑,中国共产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三是把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一盘大棋局,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党的领导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从根本上而言是由其先进性所决定的。秉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判断,习近平指出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认为这是“最鲜明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能有效避免其他政党仅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少数政治精英的历史积弊。另一方面,对国家治理全领域、众环节、诸层面的全面嵌入。党的领导,无论是在“五大建设”领域还是在军事、外事领域,不管是在中央层面抑或是在基层层面,不论是在决策环节还是在执行环节,都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地全面介入、强化。

(二)立场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完全价值无涉或纯粹价值中立的国家制度。任何一种国家制度的建构、设计及其运行,无不彰显或呈现特定的价值取向、价值关怀。作为一种承载社会主义属性的国家制度形态,中国制度也不例外,也秉承特定的价值、持守独特的取向。这种价值、这个取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国家制度构建上坚持以人为基点,以人民为主体和目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是国家制度建构及其运行的基本主体,国家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都是以人为基点、以人为目的开展的。与黑格尔从国家出发建构国家制度不同,马克思强调要从人出发来创设国家制度,强调人民是创造国家制度的真正主体性力量。作为历史建构之主体性力量和

根本目的的人,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主体和基本出发点。现代国家制度成长的政治逻辑,决定了现代国家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有生命的、追求自己目的的、使用实践力量的以及受到一定生产条件、历史条件和时代制约的现实的个体的自由发展。在马克思的语境下,人民具有双重意涵:一重是现实性,另一重是自由性。前一重意涵决定了国家制度的现实逻辑,即国家制度不是基于天国而是基于尘世、不是基于“绝对精神”而是基于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条件而建构的产物;后一重意涵决定了现实的国家制度的核心价值 and 取向,即以现实的人的现实需求为导向,以崇尚人的自由权利为基石,并使人的需求、自由权利通过现实的法律予以保障,从而使法律成为支撑人的自由权利的一种存在形态。中国制度不是从天而降,更非与生俱来,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进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自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发展中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制度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因而,人民是中国制度的主体和目的。以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为主体、为目的,而非以社会上少数人为主体的、为目的,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比如,奴隶社会究其本质而言是以奴隶主为主体、为目的,封建社会从其本质上而言是以地主、贵族集团为主体和目的,资本主义社会终究是以资本为主体、以服务少数资本家为目的的社会制度。正如有学者所言,真正治理美国、决定美国政策走向的不是平民大众,而是位居社会上层、拥有巨大能量的精英。

第二,在国家制度运行中坚持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民主是建立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制度,因而,“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的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是体现国家制度本质属性、一般

规律、普遍需要的正宗的制度形态。“民主的真正意义”就是民主的实质和内容,而非形式。中国制度从内在、内容层面鲜明体现了民主的真正意义,即人民民主。无论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还是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始终参与其中并拥有自主的地位。可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自然而然亦是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民是中国制度的“姓”,是体现其存在依据的内在基因。我们国家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前面都冠以“人民”,如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团体、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和功能定位。中国制度具有独特优势、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既在于其扎根于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丰沃的社会土壤之中,更在于其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因而深得人民拥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所谓的民主实质上是名不副实、名实相悖。比如,从2020年5月开始以非洲裔公民弗洛伊德事件为导火索持续发酵的抗议游行活动迅即席卷全美,充分暴露出美国长期存在的对少数民族群的严重歧视等虚伪民主问题,“美国的民主对黑人并不适用”的结论不证自明,这与中国制度下各民族一律平等、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三,在国家制度优劣的评价方面坚持以人民的意志为基准。无论是从历史的视野还是从理论的逻辑分析,人民群众都是创造历史进步、推动社会变革、实现制度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力量。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合法性和社会正当性,人民享有对国家制度是否优良、科学、先进的最终评价权。无论是2014年9月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的衡量国

家政治制度民主性和有效性的九个方面标准,还是在2019年9月24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的衡量社会制度科学性和先进性的三个标准,习近平都特别强调人民的主体性以及对制度的根本评价权。诚如其所言,中国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实践也充分证明,中国制度之所以是新型的,关键在于其厚植、深扎于人民之中,能够充分彰显人民意志、激发人民伟力、维护人民权益,从而有效确保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是对人民评价权的高度重视,不仅关注对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客观层面利益问题的破解,而且注重对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主观感受层面的满足,力求在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可能与可行的平衡中让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应。反观“二战”后的苏联模式,仍奉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民生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和适时改善,人民的不满情绪也日益滋长并不断公开宣泄,致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积弊日增、活力衰减,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综合上述分析,中国制度的本质属性在于其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不仅能够充分代表人民意志、广泛集聚人民智慧、切实维护人民利益,而且强调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主体作用、主体价值,从根本上决定并确证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代表性、正当性,从而为中国制度优势、优越性的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源泉、动力资源和力量支撑。

(三)方略层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中国制度并非静止不变、原封不动,相反,在不断生长、成长的过程中趋向成熟、优化、健全、完善,这种生长过程必定会形成一定的方

略、呈现一定的逻辑。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制度的生长方略或生长逻辑就是守正创新,即既强调守正的必然性价值,也强调创新的必要性意义。最初,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用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制度的表述,侧重强调对中国制度的创新这个向度。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改成“坚持和完善”,对中国制度发展方略的关注更加辩证、全面,不仅注重对之完善、优化的创新性要求,而且强调对方向性的、根基性的、立场性的、原则性的制度持续固守的守正性要求。习近平在关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的说明中特别强调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进行讨论。由此可见,对中国制度不仅要创新(即完善和发展),也要守正(即坚持和巩固)。中国制度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制度构想的简约化践履,不是对传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探索经验的复制临摹,不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线性”延续,也不是完全基于中国特色的“特立独行”,更不是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实践的照搬照抄,而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基于中国特有的历史递嬗、文化结构、社会基础,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展伟大的社会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所创设、建构的新型国家制度体系。这套新型国家制度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体现了守正的禀赋;又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等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超越和扬弃,是人类制度文明史尤其是政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彰显了创新的特质。简言之,守正体现为坚持和巩固,创新体现为完善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度在构建原则、生长方略层面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这使其既有别于初期重守正轻创新、后期重创新轻守正的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

主义,也有别于只强调创新而忽视守正的资本主义,体现了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

守正之“守”,即坚守、守护、持守,体现为一以贯之的赓续、无坚不摧的定力、丹心如故的忠诚,因此对中国制度的优势、优越性要有定力、有自信、有主见,要坚持不懈、坚持不渝、坚定不移并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绝不自乱阵脚、自失主张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半途而废。守正之“正”,即正道、正理、正言,体现为对科学社会主义之本质规定性、内在规律、基本原则的承继。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制度建设中,之所以强调守正的价值,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传统是制度存续的历史根脉和现实前提。轻易改变、丢弃传统和常规,后果不是乱就是亡。在中国制度建设中,一定要观照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资源禀赋,不能与不同发展时段、不同民情结构的国度简约化地进行类比甚至照搬移植他国制度,否则会导致水土不服、淮橘为枳,甚至会给国家良性有序发展带来灾难性破坏。其二,中国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并非无立场、无基点、无方向、无取向、无原则,相反,目标清晰、立场坚定、取向明确,是要使其“更好”。其三,只有正本清源,中国制度这棵参天大树才能枝繁叶茂,中国制度这条大河才能源远流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会坚如磐石、坚不可摧。总之,守正是坚定制度自信的根本依据、根本支撑,是实现制度自觉的现实基础、基本前提。

如果说守正彰显的是制度自信的话,那么,创新则意味着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一定边界内的制度变迁、制度变革。习近平深刻指出,“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之所以强调创新,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运动是事物的固有属性、首要特性和存在方式。中国制度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形成某种顽固不化的所谓“模式”,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而臻于完善。其二,有效的

创新本身就是最好的坚持。制度建设要获得长期的有效性,需要与时俱进,也就是要进行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兼收并蓄。然而,中国与外国在历史文化、发展阶段、民情风俗、社会结构诸方面差别不小,不仅面临后发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转型困境,也遇到自身转型升级所存在的独特情境,如多元社会思潮与一元意识形态主导的统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民主与民生的协调、活力与秩序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等。消解这些困境和悖论,不能希冀直接复制外国经验,只能基于我国自身的时间、空间、历史条件实事求是地进行创造性探索实践,别无他途、捷径可走。借鉴、吸收外国有益经验一定要固本,要因地制宜而不能胶柱鼓瑟、东施效颦,否则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其三,消解中国制度运行、发展的诸种障碍性因素,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变革传统,以利于进一步挖掘制度潜力、激发制度活力、增添制度动力。守正是创新的基本前提和现实基础,创新是守正的完善和发展。因此,既要守正,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本原理,绝不邯郸学步而失去自我,绝不照搬西方经验而致水土不服;也要创新,绝不夜郎自大而故步自封,绝不墨守成规而止步不前。

(四)层次结构层面: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渐次延展

层次性、结构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特征。一般而言,一事物层次越多元、结构越复杂,其成熟性越高、韧性越大、适应性越强。唯物辩证法认为,要深刻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必须对事物的结构层次及其诸种展现形态有全面的辨识和准确的认知。中国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体系,在运动、运行中也呈现一定的层次结构。因此,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理解,需要在其运动发展中加深对其结构层次的把握。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制度的理解是随着实

践的扩展日益深入的。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概念,将其视为一套制度体系,并对其基本内涵、内在结构、主要特点、重大意义进行了精辟阐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内在结构,即把中国制度概括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这“三位一体”的结构形态。中共十八大报告基本沿袭上述表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由此,中国制度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这“三位一体”的层次结构形态拓展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这样“四位一体”的层次结构形态。

所谓“根本制度”,指的是那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质的规定性、反映中国制度的本质属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具有内在支撑性、全局统摄性、长远引领性、价值指向性。根本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运用,集中展现社会主义的性质、优势、优越性,深度彰显社会形态特质的制度属性,具有显著的界分性、明显的区分度。根本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假若根本制度缺失,可能产生方向性偏误、颠覆性错误;假若根本制度根基不牢,可能会使整个制度体系运行不稳、不实。所谓“基本制度”,指的是那些反映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本关系、决定中国制度基本形态、框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高度的制度,具有基础性、基石性、奠基性、前提性意义。比如,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所谓“重要制度”,指的是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衍化、生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主体性制

度,具有结构承载性、形态拓展性、功能支柱性。比如,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重要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上承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下启具体制度;上连国家治理结构顶层设计,下接社会生活基层样态。所谓“具体制度”,指的是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催生出来的不承载社会制度本质属性、不直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在细节方面很明确的体制、机制等。比如,立法体制机制、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就业促进机制等。具体制度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组织形式,既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制约和规定,又随着时间、地点、历史条件的变迁而变化。因此,通常讲的制度创新、制度变革主要是在具体制度这个层面。邓小平曾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中的“具体做法”就是指具体制度。在中国制度体系中,具体制度既具有具象化、细致化的特征,又具有灵活性、创新性,是中国制度变革、制度创新的主要场域。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制约性,又是一体化、同质化的,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属性相同、基质相同、取向相同,有机统一于中国制度体系之中。根本制度位处最深层,对整个制度体系具有决定性影响;基本制度位于枢纽位置,对整个制度体系具有内外贯通、表里勾连的功能;重要制度位于主干层,对整个制度体系发挥主体性支撑的作用;具体制度位于最表层,是整个制度体系效能彰显的实现样态。各个层级、层次的制度表里相依,内外衔接,同向发力,协同耦合。实践表明,如果没有根本制度的鼎力支撑,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就会失去根基,具体制度也会迷失方向;如果没有基本制度的有力联结,根本制度与重要制度、具体制度之间的“交通”就会失去枢纽;如果没有重要制度的多向度擘画,

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就会缺乏主体性框架结构的支撑,具体制度也难以枝叶扶疏、绿荫如盖;如果没有具体制度的拓展落实,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功能激发就会失去实现平台和表达载体,徒具抽象的意义性建构,难以落地落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等层次所形构的中国制度体系,彰显了中国制度的复杂性,也体现了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从制度的层次结构来分析,苏联模式的失败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而是其具体制度的创新性、开放性不足,存在封闭僵化的短板,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有先进性,但没有得以有效激活;当代资本主义虽仍具一定活力,但并非因为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先进、科学,而是其具体制度的创新性较强。层次性是事物复杂性的重要表征。由低层次到高层次跃升,从简单层次向复杂层次演进,是事物由小变大、从弱变强的鲜明表现。物质形态的层次性以及新层次的生成,表明物质形态各层次各有其特殊的结构和功能,因而不能把不同层次简单等同起来。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扩展,表明中国制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在结构和功能方面有新的拓展,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协调性、平衡性。

以上从方向、立场、方略、层次结构四大层面面对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方向层面,中国制度以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目标取向,主要处理的是“一”与“多”的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构建一元化的党的领导体系与保持多元社会主体的活力、积极性。在立场层面,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其根本价值取向,主要处理的是“变”与“常”的关系,即不管制度怎么变,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始终如常。在方略层面,中国制度坚持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取向,既强调革故鼎新,也强调回归根本,主要处理的是“新”与“旧”的关系。在层次层面,中

国制度注重在坚持已有结构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不断丰富结构取向,主要处理的是“繁”与“简”的关系。实践表明,只要正确处理“一”与“多”、“变”与“常”、“新”与“旧”、“繁”与“简”的关系,中国制度就能行稳致远、越来越好。

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重大意义

全面把握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以及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及其本质

探究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不能就制度谈制度,而必须把它放在作为实践、理论、制度、文化有机统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中加以审视。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的认识逐步拓展并日益深化。改革开放之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限于道路这个层面。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所致开幕词中明确强调了这一点,他明确指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念,建构起道路与理论体系“两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构。中共十八大开始建构起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构。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提出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与文化“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构。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日益拓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把握越来越深入。中国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形态层面的反映,从制度形态的维度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则体系、规制结构,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特性、品性的具有相对恒定性的标志物。中国制度相较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具稳定性,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具象性,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具显像性,因而成为辨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标志、最基本的判据、最集中的体现。由于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与中国制度的本质直接同一,因而把握准了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对理解中国制度的性质、本质具有前提性价值、基础性意义。从这个角度看,认清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真正意涵、本真意义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因此,把握中国制度的主要特征尤其是本质特征,成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现实也最深刻的使命。

(二)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

从历史演进的进程综合考察,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有三种存在形态:思想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关于理想的国家制度,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有过天才的构想。比如,1516年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莫尔写作并出版了空想社会主义震古烁今的“开山之作”《乌托邦》。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未来乌托邦这个完美的国家制度进行了生动的擘画、精心的构想。此后300多年里,无论是康帕内拉对“太阳城”的描绘,抑或傅立叶对“和谐制度”的设想,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想国家制度的想象和吁求从未止息、不曾停步。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主要只有前两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完全实现,而是1917年由列宁在俄国首先开创并逐步确立的,至今仅100多年。虽然列宁亲身经历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实践较短暂,但他以深邃的战略眼光、非凡的改革魄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举措”。之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摸索,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最终招致亡党亡国的下场。中国

制度不仅没有在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下黯然退场,相反,在21世纪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有力地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科学社会主义“崩溃论”的崩溃,足以使中国制度彪炳国际共运史册。

同时应该看到,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实践历程尚短、经验不足,尤其是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的中国制度而言,更是如此。如何从碎片化的建章立制到整体性的制度体系构建,如何使中国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日益健全、优化,成为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新“考题”。通过对中国制度本质特征的把握,进而深入理解中国制度的本质,能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感性走向理性,从而在新的高度、新的起点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

(三)有助于增进对“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的理解

制度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成果和产物,人类社会的发展铸就了人类制度文明史。把任何一个事物放到人类制度文明“大历史”的视野予以考察,要么恢宏壮阔,要么微不足道。中国制度应该属于前者。无论是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探索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领导伟大的社会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来看,不管是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追寻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壮丽征程还是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来的历史演变轨迹来分析,抑或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曲折起伏中来审视,人们都会发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确是伟大的,其所开创的崭新道路、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所形成的制度成果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且独特的伟大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

大创造”。

把握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这一重大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中国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总体状态的制度表现,具有社会形态的含义,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一种重要社会制度类型。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对不同文明形态的界分,主要以社会形态为标准。中国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自觉创造的伟大成果。因而,把握准了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等附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的“标签”的荒谬性、错漏性就不证自明。其次,制度的存在及其运行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不能完全复制,否则,要么水土不服,要么枯萎凋零,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样一种制度,由于生长的制度环境不同,其效能就有殊异,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只有把握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才能深刻理解其生长的独特环境、独特传统、独特机理,才能凸显其作为“伟大创造”的独到之处。再次,与其他制度文明形态相比,中国制度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内在免疫力和自我完善性,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驱除黏附其上的“细菌”和“病毒”,而不是通过“外科手术”予以治疗,因此具有较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其实际运行的效能、高效率正日益彰显。

(摘自《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1年第1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康晓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

刘 伟 刘瑞明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的最新判断和强国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发展困境和新的挑战,特别是随着新时代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传统发展格局和增长模式的局限日益凸显。

(一)原有发展格局下,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

伴随过去 40 多年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一,步入经济大国行列。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就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从国际竞争环境看,在过去的 40 多年中,我国凭借工业成本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全球地位的确立,但“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中国制造传统成本优势不复存

在,曾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加工贸易逐渐由东南沿海转向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吸引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不断明显,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迅速增大。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对外依赖较大、经济结构失衡、潜在风险加大等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逐渐积累加深,并伴随着外部压力增大,日益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

从国内经济结构看,过去粗放式发展模式积累了大量结构性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与区域结构等方方面面。“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经济增长空间的压缩表明,传统数量型高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在这种情况下,亟须重塑新发展格局,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看,打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外循环协同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大势所趋。“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二)原有发展格局难以应对新的全球形势变化

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改革开放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的快速变化,逆全球化出现,新兴经济体竞争加剧,以及大国经济博弈下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凸显,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迫切需要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新格局。

纵观历史,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紧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进入加速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好顺应了全球化浪潮,而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也吸引着发达国家的潜在投资者。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兴起的背景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矛盾尚未充分显现。2001年,成功加入WTO以及《中美贸易发展框架合作协议》签订,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的需求一致,为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提供了较宽松的国际环境,我国经济通过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本不足的缺陷,通过对外贸易驱动国内工业发展,引进技术进而在“干中学”中促进技术升级。一系列有利于我国开放发展的世界经济环境为我国扩大投资、经济增长提供了供给和需求方面的支持,也是我国传统经济模式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条件所在。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逆全球化”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生存环境。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发生新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发达国家转

变其全球化经济策略,发达国家经济“逆全球化”现象逐渐出现。这使得国际范围内的贸易争端和投资壁垒不断加剧,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主导下,美国政府实施了大量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行政干预等措施。美国是我国主要的FDI来源国,其对外投资政策的转变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投资水平,进而制约传统外资利用型经济驱动方式的增长潜力。

在此背景下,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

伴随着国内结构性矛盾加剧以及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我国经济亟须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化和高质量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新发展格局应运而生。新发展格局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本质特征。

(一)新发展格局是系统的“整体发展格局”

不同于以往针对某个产业或地区的发展规划,新发展格局是系统性的“整体发展格局”,以经济社会中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的互联互通为前提,通过国际国内双循环联动,实现国民经济“大循环”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新发展格局不可简单地套用到局部的地区、行业、环节或领域内,以防止经济结构失衡的加剧,防止出现地区性市场分割和“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性资源配置。

从纵向看,应保障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畅通。在生产环节,减少和消除制度、技术、成本等方面的制约,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在分配环节,通过更加合理完善的收入分配体系促进生产、消费等环节的畅

通。流通环节重点是打通生产、消费的中心环节,只有打通了流通堵点,才能真正发挥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但是,目前我国基础设施水平和流通体系现代化、一体化程度仍然不高,物流成本过大且效率较低。在消费环节,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水平仍低于同期同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释放消费潜能的关键,在于降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信息不对称水平,加强监管,提升消费产品质量,尤其在老龄化背景下,需要着重创新消费服务形式,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

从横向看,应保障产业、地区、供给和需求间的畅通。在产业间,减少低端产品的无效供给和产能过剩,缓解高端产品的供给不足。当前,我国存在着产能过剩和产能短缺并存的失衡现象,一些传统产业的产品无法被市场完全消化,产能得不到充分利用。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新产品,包括许多高质量的传统产品等又普遍无法满足人民需求。在地区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就业、增长水平,往往采用“以邻为壑”“画地为牢”等方式扶持本地企业,不仅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而且容易引发地区间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的问题,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实际上,产业、地区间的供需失衡问题归根到底是要素配置问题。目前,我国在不同维度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要素配置扭曲,引发了大量的生产效率损失,根本原因仍在于尚未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因此,未来的关键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向,优化要素配置,解决纵向、横向的不畅通问题。

(二)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改革深化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但是,改革走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导致一些地方改革“迟滞”“拖延”等现象不断增多,一些领域体制机制的弊端得不到实质性解决。例如,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

慢、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自主创新动力需要充分释放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会直接威胁到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循环为主题,通过深化改革打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新发展格局,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投入获得大的产出水平,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新发展格局重视消费拉动的需求动力转变,强调创新驱动的要素动力转变,侧重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动力转变,全方位推进的制度供给动力转变等方面,推进新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变革。

在本质上,新发展格局是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指南。因此,依靠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才能不断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从而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弱项,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三)新发展格局是一种“风险防范格局”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主动防范风险,维护国民经济安全,是一种统筹发展和安全风险防范底线管理的发展格局。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内循环中的技术创新等短板、弱项十分明显,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因此,企业生产容易受到掣肘,随时面临产业链断裂的风险。可见,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形势看,启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进行风险防范是历史必然。

从国际形势看,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的冲击,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伴随着世界各国内部矛盾的累积,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必须通过新发展格局对冲风险。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动荡不平,中美关系渐趋复杂,贸易争端不断,打破了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共赢的格局。在这种局势下,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博弈方式,平添了很多不确定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这就要求我国及时作出防范,重塑新的发展格局。

(四)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

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时代矛盾,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波动性和周期性,从而保障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

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从一开始就具有突出的问题导向,是出于更有效地解决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发展格局就是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从而保障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格局,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现代化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具体部署了这一历史进程,在“十四五”期间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赶上当代中等发达国家;2050年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赶上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践,将根本改变现代化的格局和路径,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新发展格局恰是应对挑战的必然要求。

三、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

在认识新发展格局四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整体性发展格局”,要求全面破除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质是供求均衡。供求均衡作为经济均衡发展的底层逻辑,也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的起点;第二,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改革深化格局”和“风险防范格局”,表明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供求均衡的战略支撑是创新引领,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而在这一过程中,又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以“一带一路”为战略重点,以“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为战略突破口;第三,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目的,需要以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为目标,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实质是供求均衡

新发展格局作为一种“整体发展格局”,旨在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此,新发展格局逻辑的起点是供求均衡。供求均衡包括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

1. 总量均衡。总量均衡是供求均衡的基础,总量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形成经济短缺和通货膨胀。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落后,再加上长期忽视经济发展,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预算软约束等体制原因,供给能力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规模还是结构,都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这一期间因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发生过3次严重的通货膨胀,1985年(CPI上涨9%以上)、1988年(CPI上涨18%以上)和1994年(CPI上涨24%以上)。伴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市场约束日益强化,近些年,我国总量失衡问题更多地演变为供给过剩和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2. 结构均衡。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均衡,是现阶段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应着力破除并存的产能过剩和产能短缺的失衡现象。目前,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低端传统行业和低质量消费品及服务方面,而产能短缺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品、创新性产品和高质量消费品和服务上。在区域结构方面,地区间差异显著,2019年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已接近西部地区的2倍,南北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仍然巨大,未来“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资源配置结构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未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是新发展格局的体制条件。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依然严峻,这种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会从总体上限制国民经济中消费需求的的增长,成为国内大循环构建的障碍。

(二)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是创新引领

从世界经济大国博弈的历史进程看,一个明显的规律在于,“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在与英国的贸易竞争中取胜,正是得益于技术创新和生产变革。这就意味着,创新引领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既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摆脱西方国家“卡脖子”、提高国际竞争主动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本和技术约束,自主创新成本较高。当时,我国整体的发展程度较为落后,技术水平距

离世界前沿面的距离较远,与发达国家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能够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同时,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形成后发优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距离世界前沿面越来越近,与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的利益冲突逐渐增大,技术引进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最前沿的领域,也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如果自主创新能力得不到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那么国内大循环的构建也就无从谈起。现阶段,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力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政策和法律法规,创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动的体制环境”。而“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动的体制环境”需要在“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搭平台”的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框架下,改变传统增长模式以投资拉动和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升级路径,打破传统增长模式对企业创新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积累的体制机制束缚,实现科技创新由引进吸收向自主研发为主的根本性转变。

(三)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潜能,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做好应对国际市场萎缩的防范,其战略基点便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这与新发展格局作为一种风险防范格局是内在一致的。

从投资需求看,2015年以来,我国工业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18年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达23.47%,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已超过30%,拥有按联合国划分的41个大类、191个种类、525个小类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产业

链。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均超过50万亿元,但存在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尤其是优质的投资需求不足,表现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都与世界前沿存在着较大差距。对此,我国未来应围绕《中国制造2025》进行制造业转型升级,充足的投资需求潜力等待释放。我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完全有条件在未来释放出大量的投资需求。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5亿,占比60.60%,未来仍有巨大的空间释放“人口红利”,对消费方式水平和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拥有4亿多人规模的中等收入阶段,进一步支撑着我国消费需求的稳定基础。当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总量潜力巨大的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制约消费需求的难题:进一步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解决好人民群众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充分释放消费需求。综上,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是扩大内需,并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国民经济各环节之间的畅通循环、相互促进。

(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之一是打通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这就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

第一,需求疲软导致的下行风险在于,无效供给得不到消化和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

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种供需结构的失衡主要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资源大量被配置到那些市场无法消化的生产部门之中,形成了无效的供给和过剩产能,而那些市场需求仍未能得到满足的生产部门却获取不到足够的生产资源,形成供给的短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归根到底是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破除体制机制的不畅,对于无效供给的过剩产能予以破除,释放出更多资源用于创造有效供给,从而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

第二,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重要原因在于相应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较高。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中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土地红利、外贸红利逐渐变弱,实体经济的“硬成本”不断上升,进而为“软成本”的下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尤其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涉企收费,降低用能、物流、融资等成本。从客观看,无论是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还是外资撤离,都和实体经济成本过高有关,应进一步通过“放管服”改革实现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也要对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期累积的诸多制度障碍(如融资困境、税负较重)予以破除。

(五)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是“一带一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要高度重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并不是简单地强调国内大循环,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国民经济的新发展。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新时代新型高水平的开放集中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因此,

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现经济疲软、“逆全球化”抬头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构成了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

新发展格局下的“一带一路”战略,由我国倡议推动,基于沿线国家资源、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各施所长、取长补短”。一方面,将对沿线国家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且性价比高的产能因地制宜实现有效转接,能快速转化为高效率的生产能力,使国内企业国际市场中继续保持竞争力,从而“对内”实现要素有效配置、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满足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加强资源开发和产业投资,延长产业链条,有助于东道国实现生产要素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且通过促进就业提高东道国人民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因此,“一带一路”能够实现我国与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优势互补,使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再通过国际循环优化国内循环,构建新型互利互惠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一带一路”推动发展双边、多边自贸区与国际组织合作,能够促进商品与服务贸易,扩大投资,开展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以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国际市场中,有利于激发技术溢出、制度创新、市场竞争活力,进一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促进技术、制度以及管理创新,最终服务于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

(六)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突破口是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创新是以试点方式开展政策试验机制。试点作为一种以局部试验带动整体改革的渐进式治理机制,极大缓解了改革的不确定性,以较低的成本推进改革。“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因而,利用试点的方法,以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打造作为战略突破口,创造更多更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发挥示范效应和引领效应,可以更为有效地带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分化和差距过大是当前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未来,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需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利于打破既有的体制机制束缚,解决当前一些区域发展中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机制不畅、合作分工程度不足、重复建设等严重问题,形成新的增长极。新的区域性增长极的培育对于构建新格局具有示范引领作用。近年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党中央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大胆设立各种经济“试验田”,意图通过这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筑区域增长极,为我国经济崛起寻找新的突破口。

(七)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其目标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现代化经济体系又集中表现在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运行体系”几方面。

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一种“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意在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

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就是“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现代化的收入分配体系应当是“公平与效率携手并进”的分配体系,通过这一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现代化的区域发展体系要发展成为“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核心是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现代化的绿色体系就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现代化的全面开放体系,就是“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现代化的经济运行体系。就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总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是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新发展理念的机制和条件。这种本质特征,也恰恰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

(八)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必须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看待。新发展格局不是一时被动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新中国建国伟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探索,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富起来”的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创造了人类反贫困的发展奇迹,并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发展基础。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强起来”的现代化新征程。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面对挑战,把握这一新的历史性机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新发展格局被赋予了“更高起点、更高层次和更高目标”的使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高起点”,就是站在我国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对于我国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作出新布局;“更高层次”,就是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突破现有体制的障碍,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更高目标”,就是瞄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定地沿着“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一步步落实,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摘自《宏观经济管理》2021年第4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作者简介: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路径

陈晓东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总是相伴相生。随着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新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持续升级,产业结构因而被不断重塑。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产业结构加速演进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尤为显著的就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产业结构演进的重大影响。

产业结构升级,本质上是产业体系中相对较为高级的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的过程,其发展方向是高技术化和高集约化。由于现实经济活动的连续性,产业结构中各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各构成部分之间,并非绝对割裂而是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内在联系,产业结构升级呈现为复杂的系统演化过程。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基于互联网平台进行资源配置,催生出新的产业,为传统产业提供转型升级路径,进而对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演进产生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理解我国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进一步探索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路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课题。早期研究大多从数字产业化或者产业数字化的单一视角来研究二者的关系。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发展日渐深入,综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来探讨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

从单一研究视角看,数字产业化通过信息通信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数字化通过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和效率提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综合研究视角看,数字经济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动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向技术含量更高、环境友好型的方向演进,是我国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经济能有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其内在机理。历史经验表明,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会带来经济范式的变化。在新的经济范式下,新兴产业往往会超越传统产业逐渐成为产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并通过产业关联、技术扩散等效应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使产业结构向更高水平升级。就数字经济而言,其以数据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的高效清洁、低成本、可复制以及可海量获取等特点克服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固有缺陷,且能有效解决工业经济时代边际报酬递减等问题,是能够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动能。在实践中,相较于农业和服务业,制造业是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领域。

关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基本方向

数字经济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向刺激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重塑产业结构的形态。

数字产业化孕育新产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数字技术通过产业化发展成为新的产业。经过信息技术几十年的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已较为成熟,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迅猛并正在引领数字经济的发展潮流。这些新的产业使产业结构的内涵日益丰富。

数字技术催生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商业模式进而形成新的产业。相比于以企业价值创造为中心的传统商业模式,数字技术催生出以客户价值创造为中心、基于互联网创新的商业模式,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福利无谓损失等问题,增加了商业利润、激发了商业活力,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

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产业数字化催生了可感知的智能生产模式。在生产工艺方面,基于数字技术与工业软件的增材制造技术,突破了传统减材制造技术难以生产复杂结构部件的约束;在生产工具方面,工业机器人快速发展,甚至逐渐具备自我感知、判断和决策能力,其广泛应用代替了大量重复性的人类劳动。

产业数字化塑造了可视化的产业组织模式。作为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的平台和载体,工业互联网实现了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设备和产品的联网,搭建了人、机、物对话的框架,成为信息的“汇集池”和资源的“匹配器”。每一个参与主体不仅能够了解与自己有直接业务关系的合作者,而且能够清晰地辨识与其存在间接关系的各类主体,同时实时监控物理设备运行状况,从而做出精准的战略决策、推动运营优化。

总的来看,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基本方向。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

工业体系,但是产业整体的数字化水平依然较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将会极大地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今后一个时期,需在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化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并加快产业数字化的步伐。

以数字经济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路径

面向未来,我们需更加着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引领产业结构升级,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第一,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加快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从战略、目标、部署、路径、运营等方面全方位进行统筹规划。一方面,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新基建”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需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同承担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安全有序开放,加快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另一方面,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坚持“全国一盘棋”,兼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开展区域、行业 and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强化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第二,前瞻性推动数字产业化,加强前沿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数字产业化是形成新产业、实现产业增量扩能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产业数字化的支撑和保障,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当前,我国数字产业化动力不足,主要在于核心技术、前沿高科技、基础性创新等方面相对薄弱,数字技术转化及应用场景也较为受限。对此,一是要瞄准数字经济领域的前沿核心技术,前瞻性(下转第45页)

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 及其现实启示

石仲泉在2021年2月23日《光明日报》撰文认为,百年建党,百年华章,中国道路,引领方向,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及其现实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服从核心、维护核心,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且拥有坚强领导核心。(2)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基本国情,尊重客观规律,脚踏实地,奋发有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扎实向长远目标迈进。(3)科学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主体地位,要求全党“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5)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新阶段。面向未来,要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百年大党永恒的价值理念与 奋斗本色的双向互嵌

叶本乾、方素清在《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撰文认为,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0年光辉历

程,是不断追求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和推进实干为要的奋斗本色双向互融的伟大历程。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理念,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实干为要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本色,是践行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生动写照和品质凝练。人民至上与实干为要是辩证统一的,两者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相辅相成。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机制联结,基于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通过理论武装与学习机制、推进工作运行机制、干部担当作为机制、共商共治共享机制,把依靠人民和服务人民有机结合,以实现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人以实干为要为行动准则,坚持调查研究,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结果导向相结合,推进和保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落到实处,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至上的时代内涵,赢得了人民的忠心拥护和爱戴。只有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和实干为要的实际行动相融相嵌,才能凝聚起磅礴的人民力量,在实干中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把提高政治能力放在首位

孙兴维在2021年3月4日《解放军报》撰文认为,政治能力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是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政治集团,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但过硬的政治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长期学习实践中锻炼、培养出来的。政治上的坚定离

不开理论上的坚定。要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提高观大势、谋大局、促发展能力,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奋力开启新征程、开创新局面。要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要敢于斗争、及时发声,勇于亮剑、果断批驳,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立起主导、占领阵地。强化政治意识、提升政治能力,把重大任务作为最直接的训练,把解决棘手难点问题作为最重要的检验,把繁重工作考验作为最有效的课堂,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最实用的过程,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切实在强军兴军实践中不断锻造提升政治能力。加强政治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政治本领提升了,才能更好地增强政治执行力,才能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办事情,做到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大局,不断改造和提升自我,为党和人民作更大贡献,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战略引领

郝宪印在《东岳论丛》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智慧、传统和优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和十五年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宏伟蓝图,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举措和路线图、时间表,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纲领性指导文献。《建议》提出了未来经济

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不渝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看当今 中国的时代性质

成龙在《浙江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时代性质是关于时代的质的规定,是时代观的核心内容。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时代性质是由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交往关系、力量或因素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曾研究过时代性质,提出过相应的时代观。自20世纪下半叶起,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呈日新月异之势,人类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更是翻天覆地。进入21世纪之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更以空前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的面貌。新时代认识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性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坐标轴,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结合中,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比较中,抓住当今世界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做出具体分析。从发展模式看,这是西方模式独占鳌头局面结束与中国模式走向成熟的时代;从发展动力看,这是中国

与西方抢占新工业革命制高点,有可能领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从全球问题看,这是西方国家治理弱化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

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建议

陈楠、蔡跃洲在《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2期撰文指出,通过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国际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就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展望后,得到如下结论:1.主要经济体争相出台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既是对过度金融化造成“脱实向虚”的反思,更是顺应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保持各自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内在要求。2.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战略规划在目标愿景和具体领域布局上具有高度趋同性。3.疫情蔓延后,中国制造业表现出的强大产能和完备体系,强化了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制造业的警惕和遏制。4.疫情后,中国制造业发展也存在实施国产替代、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善国内产业生态体系的机遇。就疫情后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充分估计中美之间博弈竞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第二,以新冠病毒检测、药物临床试验、疫苗开发等为切入点,建立跨国研发合作机制,适时将合作范围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等制造业重点领域拓展。第三,将日韩作为重点合作对象,大力加强和改善与两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经贸合作,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第四,以“一带一路”为纽带,加强同欧洲各国在先进制造业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最大限度拓展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发展空间。第五,大力支持研发推广关键核心技术,加快补齐制造业发

展和科技创新短板。

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制度型 开放的政策建议

李大伟在《开放导报》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国更加有效地在供给侧面向全球集聚高素质人才、先进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也要求面向世界高端需求优化供给结构,从而推动供需向更高层次平衡跃升,还迫切要求深化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有利于集聚全球要素、引领全球经贸规则升级的规则体系。据此,提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建议:(一)以人和数据两大重点要素流动的规则为重点,统筹推进边境规则和“边境后”规则的协同,实现高素质人才和高质量数据的集聚。在人才方面,重点在于构建有利于吸引全球高素质人才来华创业兴业的自然人流动制体系;在数据层面,建议明确提出将数字贸易的内涵拓展到数据流相关的跨境商品流动和相应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主动建立数字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则。(二)以优化自身要素配置和塑造体制优势为目标,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补贴政策、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新型规则设计。(三)在传统贸易、利用外资等领域继续完善现有规则并提升开放水平,同时加快推进标准国际化。(四)积极推动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规则对接和协调。(五)积极构建制度型开放框架下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体制机制。

(张雅丽/编 井虹/校)



加入 WTO20 年:中国与 WTO 互动关系的演进

屠新泉 杨丹宁 李思奇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 143 个成员。加入 WTO 以来,中国的发展超出了绝大多数人在当初的预期。中国在加入 WTO 之时单方面作出了广泛而重大的市场准入和规则调整承诺,以主动适应和融入多边贸易体系。在此后的近 20 年中,中国切实履行了这些承诺,并为 WTO 的运行、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中国与 WTO、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快速而根本性的变化,在 WTO 改变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影响着 WTO 的运行方式、利益结构和权力框架。作为当前体系的在位既得利益者,一些发达国家与美国一样,对中国的全方位融入所带来的冲击心存疑虑和警惕,并试图通过国际规则的调整来加以约束。而对中国来说,如何评估中国与当前多边贸易体系的关系,如何看待和应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质疑和制约,如何理解中国在 WTO 中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如何发挥中国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建设性作用以维护和推动 WTO 的发展,是中国更好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必须思考和应对的问题。

一、中国切实履行承诺及中国对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加入 WTO 对 2001 年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未平,1998 年、1999 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 8% 以

下,虽然 2000 年勉强达到 8%,但 2001 年再度下滑至 7.3%,以至于“保八”成为当时经济增长的一个默认目标。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 WTO 的条件相当广泛、深入甚至堪称苛刻,对于 2001 年的中国来说,完整履行如此宏大的国际义务绝非易事。但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将加入 WTO 的挑战当作促进改革开放的机遇,发起了一场全面的 WTO 规则学习和执行运动。而从结果来看,虽然在加入 WTO 时作出了重大让步,接受了众多诸如特殊贸易审议政策、特殊保障措施等条款,放弃了很多本该享受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然严格推进承诺履行,扩大市场准入,执行国际条约义务,对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 中国切实履行加入 WTO 时的承诺

评估中国是否履行了承诺,应以中国加入 WTO 时签署的法律文件为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根据《议定书》第 1 条第 2 款的规定,《议定书》及其 9 个附件、《报告书》第 342 段所指的相关段落的承诺,构成《WTO 协定》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具有法律效力。具体来说,包含以下部分:

1. 修订相关法律

WTO 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组织,由全体成员共同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协议构成每

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律体系。为了实现国内贸易法律体系与 WTO 规则的对接,中国自 1986 年开始“复关”谈判的同时就已经着手国内法律调整的准备工作。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新立法工作: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2300 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 1925 多件。调整的相关法律包括:对外贸易法、货物贸易法、服务贸易法、知识产权法、外商投资法和立法法等。

2. 履行货物贸易领域承诺

第一,削减关税和降低非关税壁垒。中国在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的同时,显著削减非关税壁垒,关税总水平由 2001 年的 15.3% 降至 2018 年的 7.5%,关税约束覆盖率达到 100%,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南非等尚未实现关税约束全覆盖。根据 2018 年 6 月 WTO 秘书处发布的《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报告》,2017 年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 14.8%,远低于发展中成员 56% 和发达成员 39% 的平均关税水平,超出了对 WTO 的承诺。2019 年中国非农产品关税降至 6.5%,显著低于一般新兴市场国家,且和发达国家美国的距离在进一步缩小,除此之外,中国的所有产品平均关税、农产品关税也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按承诺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

第二,全面开放外贸经营权。放开外贸经营权是中国加入 WTO 承诺中最具贸易扩张效应的贸易政策调整。自 2004 年 7 月起,中国进出口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大大提高了企业外贸活动的活力,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积极性,这也为随后中国跨境电商的大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2019 年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第三,履行 WTO 补贴通报义务。加入 WTO 之后,按照 SCM 的通报要求,中国多次将

国内补贴政策向 WTO 通报。通报按内容不同分为三类:一是根据 SCM 第 32.6 条要求通报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变更情况;二是根据《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16 条第 1 款、SCM 第 25 条要求通报国内有关补贴政策;三是根据 SCM 第 25.11 条通报国内反补贴措施。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根据 SCM 第 25 条通报国内补贴政策共四次,补贴措施涵盖时间为 2001—2014 年。

3. 履行服务贸易领域承诺

2007 年,中国加入 WTO 承诺中的服务贸易开放即履行完毕,开放了 WTO 分类下的九大类 100 个分部门。中国按期取消服务领域的地域和数量限制,不断扩大允许外资从事服务领域的业务范围。

从外商投资设立企业的产业分布来看,自 2005 年开始,第二产业外商投资企业占比开始逐步下降,而第三产业开始稳步上升。2008 年,伴随着中国逐步放开服务业市场,第三产业外商投资企业数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占比,且 2018 年达到了 73.7%。从绝对值来看,从 2005 年开始,外商投资注册企业数量稳步上升,由于中国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第三产业外商投资企业增长速度较快,2018 年达 43.7 万户,同比增长 15.6%。加入 WTO 以来,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除了认真履行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外,还致力于超越 WTO 承诺实现自主对外开放,主动引入国际先进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措施。2018 年 6 月 28 日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较之前大幅减少了对外商的限制措施,其中对服务业的限制措施仅限于 22 个细分领域,并对部分领域列出了取消或放宽准入限制的过渡期,过渡期满后将按时取消或放宽其准入限制。根据公告的说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4. 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承诺

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中国的核心关切,也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疑虑较多的领域。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构建了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并持续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在立法方面,中国重新修订《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在执法方面,中国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并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和专门审判机构,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执法力度和惩罚力度,为知识产权提供了有效保障。1998—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每年均对外公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

(二) 中国对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1. 中国加入 WTO 带动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

中国加入 WTO 后开放了巨大的市场,提高了 WTO 的影响力以及覆盖的人口量和贸易量,其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为全球就业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拥有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自身的快速增长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重大贡献。中国扩大对外贸易,降低世界商品价格,提升了消费者福利,扩大了对相关产品的需求,繁荣了世界市场。同时,中国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通过免关税和免配额等贸易优惠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贸易援助,促进了世界经济平稳增长。

在经济和贸易发展方面,中国加入 WTO 后开放了巨大的国内市场,惠及全球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入 WTO 以来,中国经济稳步增长,GDP 由 2001 年的 1.339 万亿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14.343 万亿美元,占世界 GDP 的比重由 4% 上升到 16.3%。2018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7.5%,已连续 13 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是世界经济稳

定增长的“发动机”。同时,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和投资空间,为全球创造了更多就业,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据《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1369 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存量达 2 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投资领域向服务业倾斜,覆盖国家面极广。截至 2019 年末,中国共在 188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4.4 万家企业,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实现了覆盖面广、重点突出的效果。同时,投资结构更加均衡,投资领域主要为租赁和商业服务业、银行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比 14.6%,非金融类占比 85.4%,其中制造业投资占比 14.8%,推动了全球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

同时,作为世界重要的净资本输出国,中国积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平稳运行。截至 2019 年末,中国“走出去”企业外籍员工超过 220 万人,拉动了当地就业市场发展,且部分项目填补了其产业空白,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2. 中国积极参与 WTO 各项工作

中国自加入 WTO 之日起,就积极参与 WTO 的各项工作。第一,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作为 WTO 的新成员,中国将自己视为富有建设性的参与者。虽然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始终未能成功结束,但在 WTO 所有在 2001 年之后取得的谈判成果中,都离不开中国的贡献。中国是《贸易便利化协议》成功达成的重要贡献者,且主动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参与了全部诸边倡议的金砖国家,包括《信息技术协议》扩围谈判、《环境产品协议》、电子商务谈判等。第二,中国积极参与 WTO 的各项发展援助和促贸援助活动。如在南南合作中,中国设立了专有研究机构对合作方式、合作范围等进行研究,同时

为发展中国家的公务员提供奖学金,以加强其能力建设。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将中国和印度确定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南南发展合作伙伴与融资来源。2019年12月,第三次关于最不发达国家与发展的南南对话在瑞士举行,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讨论 WTO 改革建议的机会,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话语权。中国积极参加 WTO 技术援助计划,通过最不发达国家加入计划(TCLAP)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实习生提供资源,帮助其更好地解决加入 WTO 问题,同时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官员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并组织有关加入问题的圆桌会议。

二、中国的融入和成长对 WTO 的结构性影响

在中国加入 WTO 谈判的 15 年中以及加入 WTO 后最初的几年里,人们关注的重点都放在 WTO 将如何影响和改变中国上。这已被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成就所证实,而近些年来,世界关注的焦点则更多转向了中国对 WTO 的影响。中国参与 WTO 对 WTO 的包容性和完整性具有天然的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巨大的体量以及独特的体制对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和发展带来了挑战。这种挑战也不是完全没有被预料到,但其影响显然被低估了。未来的 WTO 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将围绕中国体制与 WTO 体系之间的相互融合而展开。

(一)提高了 WTO 的包容性、代表性及合法性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加入 WTO 接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提供了先例和经验。同时,中国加入 WTO 后通过援助和声明增强了最不发达国家的法律地位,使得 WTO 这一国际组织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代表性和合法性。

从 1986 年正式提出申请,到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中国付出了 15 年的艰苦努力。中

国特殊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加入之时便是 WTO 成员讨论的焦点。发达国家既想打开中国市场享受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又担心中国利用这一特殊的、在 WTO 现有法律体系中尚无规定的经济社会体制捞取私利,故中国在加入 WTO 谈判之时作出了标准非常高的条件承诺,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争取取得各国理解、达成共识。最终,中国不但借由谈判提高了国民的开放意识,推动了国民对 WTO 印象的转变,也借由加入 WTO 开放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会,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这一举措为后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加入 WTO 提供了范式。同时,由于 WTO 也积累了吸收特殊体制国家的经验,也使得 WTO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包容度逐渐加强,吸收了更多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成员,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组织。

继中国之后,相继有 18 个发展中国家加入 WTO,其中既包括经济实力较高的俄罗斯(2019 年人均国民收入达 11585 美元)。也包括低收入国家尼泊尔(2019 年人均国民收入仅为 1071 美元)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可以说,中国加入 WTO 的经验和经济腾飞的历史进程,推动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加入 WTO,进一步增加了 WTO 作为国际贸易组织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二)中国的加入使得 WTO 的权力结构更加平衡

中国加入 WTO 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举措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改变了 WTO 规则制定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打破了所谓的“富人俱乐部”,使贸易规则的制定和贸易的进行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进行。但同时,这也使得 WTO 内部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实现共识的难度。

中国在 WTO 权力结构中的崛起与其不断

增长的经济实力紧密相关,中国的加入加快了 WTO 中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权力关系的调整。50 多年来,WTO 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一直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由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成员主导,而发展中成员则处于边缘地位,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但是,自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以来,随着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前发挥中心作用的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QUAD)的四国集团影响力逐渐下降,并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发生了根本性的权力转移。

中国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核心决策圈中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的力量对比,对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促使最初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如美国和欧盟)将注意力转移到 WTO 之外的区域和双边谈判,以利用实力差距实现其利益。同时,因为中国和部分发展中成员形成的新权力格局削弱了其权威,结束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也变得更加困难。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给 WTO 提出了“如何最好地处理权力移交”的问题,因为从历史上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 WTO 的结构变化已反映出权力转移,但中国尚未拥有与美国相同的权力水平。WTO 现在出现的权力结构是多极的,中美两个重要大国需要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就关键问题进行合作并达成共识。但是,双方在政治体制和经济需求上存在较大分歧,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速度、深度和广度上也存在分歧。除非美国和中国发展出可与大西洋沿岸建立的美欧跨大西洋关系相似的跨太平洋关系,否则就难以结束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现在,美国对多边主义的作用提出了诸多质疑。面对这样的挑战,预计中国将在 WTO 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还需要采取步骤确保美国和其他主

要发达成员不脱离多边贸易体系。

(三)中国经济体制与 WTO 规则的相容性

不可否认,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对 WTO 的已有规则和新规则的制定提出了巨大挑战。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使得中国在加入 WTO 之时便饱受争议,由此在加入 WTO 后便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且享受了更少的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但随着中国贸易规模的扩张、实力的增长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日益凸显,部分成员不仅不满足于要求中国在现有规则下承担与发达国家对等的义务,而且主张对现有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以有效约束中国的竞争行为。

中国的身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导致其在 WTO 内的角色定位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角色期待难以明确和统一。一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复杂性。与许多转型期经济在改革初期进行大规模私有化不同,中国始终采取一种渐进主义的混合模式。中国仍然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其特征是基于市场的定价体系和混合所有制结构,大型国有部门具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二是发展程度的复杂性。中国被认为具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尽管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水平仍然低于发达经济体。国内贫富差距仍然较大,其世界级城市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而农村地区也面临着与发展中国家类似的贫困问题。由于这种复杂性,人们对中国应在 WTO 中扮演什么角色的期望不一,也对其应享有的 WTO 待遇争论不止。

三、关于 WTO 改革的中国立场和方案

WTO 改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重塑国际角色、承担与其增强的实力相称的更多责任的过程。WTO 改革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一方面,WTO 改革将是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和战略实践,关系到中国

如何在巨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寻找自身新的定位。中国一直对 WTO 进行必要改革持开放、包容、建设性的态度,维护一个强有力的多边贸易体制也切实符合中国的经贸利益和治理需求。中国政府已经就 WTO 改革提出两份官方文件,阐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同时借助 WTO 改革的倒逼力量,有可能为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创建外部制度性基础,促使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创新性、可持续发展,增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是,在 WTO 改革的讨论进程中,中美经贸摩擦中的焦点问题正逐渐演变成为 WTO 改革中可能重点关注的问题,美欧日等发达成员提出的所谓“非市场导向”议题和“结构性改革”诉求触及中国经济体制内部,指向性和约束性明显;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危机无疑加速了上述两方面因素的演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就此,这里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一)分析 WTO 改革中不同利益集团的核心诉求,积极寻求共识、化解分歧

在 WTO 改革讨论中,一方面由于各成员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不同,对 WTO 改革的关注重点不同,提出的改革方案差异较大;另一方面各成员就不同议题相互联合,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机制,中国对此应深入分析并区别对待。在协调与兼顾各方立场时,应坚持以我为主,把握核心诉求、守住改革底线,促进各方 WTO 改革方案的一致性,弥合各方 WTO 改革方案的差异性,防止个别 WTO 改革方案的极端性。

第一,对美欧日三方机制的改革风向标作用应保持密切关注。虽然美欧日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但在推动 WTO 通报机制和透明度改革、发展中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方面已取得基本一致立场,并且在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强制性技术转让等“非市场导向”议题方面正从立场协调转向具体行动。美国希望先在核心议题上与欧盟和日本达成一

致,再推动更多成员加入展开诸边谈判,最终达到重塑 WTO 规则的目的。对此,中国尤其要对美欧日提出的“非市场导向”问题保持警惕,在深入剖析美欧日“市场经济”话语体系的含义和规制“非市场导向”问题的逻辑和诉求基础上,就“市场经济”问题形成中国自身的话语权。同时,中国应处理好与欧盟和日本的关系,在美欧日之间尚存分歧的领域,努力寻求与欧盟和日本的合作空间。其一,对中欧 WTO 改革双边机制应高度重视;继续深化中欧双方在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维护 WTO 权威性和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性等方面的共识与合作,借由中欧合作增加中国在 WTO 改革中的协同力量,并推动欧盟在中美之间发挥积极的桥梁作用。其二,跟踪了解日本的立场和态度,借当前中日关系改善之际,通过在区域层面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等路径,弥合同日本间的经贸治理规则差异,从而扩大中日在 WTO 改革中的合作空间。

第二,建立与加拿大牵头的“渥太华集团”的合作对话机制。充分发挥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多极化力量的作用,寻求多方面的广泛共识。特别是在 WTO 改革取向方面,中国与“渥太华集团”共同强调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 的中心支柱,同时认为需要探讨如何在规则制定工作中更好地涵盖发展议题。此外,中国和加拿大共同认为推进多哈回合未决议题仍是当前 WTO 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三,与广大发展中成员形成谈判合力。WTO 中 85% 的成员为发展中成员,因而缺少发展中成员参与的 WTO 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应联合广大发展中成员,更加关注 WTO 改革中的“公平”和“发展”问题,在谈判中争取较大回旋余地,为中国内部调整预留时间和空间。尤其针对美国提交的有关部分发展中成员身份认定的提案,中国与发展中成员的利益高度一致,可共同应对。

(二)对具体规则议题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对不同议题的接受程度及谈判方案

就规则层面而言,目前各方的改革诉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针对全球价值链下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等快速增长的国际商业活动新业态,要求加快制定新规则;二是认为既有的 WTO 规则未能得到很好遵守,或相关规定不合理,要求加以改革。对此,中国应深入研判不同规则议题的发展动向及其与国内深化改革要求之间的一致性,以此明确对不同规则议题的接受程度及谈判方案。

在新议题的谈判上,目前各方所讨论的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中小企业等议题,基本反映了当今全球价值链时代对国际经贸规则的新需求。在这些议题上,中国是利益攸关方,相关规则的制定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向,因此应积极推动上述议题的谈判,不排除在具体问题上达成“早期收获”。对于中国在谈判中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应区分“进攻利益”与“防守利益”,针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实践,针对性地提出谈判方案;另一方面应在坚定支持给予发展中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本原则、同时坚持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前提下,不必一般性地主张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而是基于具体行业、议题和能力,通过互惠谈判方式来确定中国应承担的义务和应享受的权利。

在既有议题的规则强化上,中国的诉求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中国可积极推动的改革议题,既包括在 WTO 成员改革方案中广泛提及的维护 WTO 权威性和有效性(遏制滥用国家安全例外和单边主义措施)、争端解决机制、通报和透明度等议题;也包括未在发达成员改革方案中过多涉及,但关乎广大发展中成员利益的农业补贴、贸易救济、渔业补贴等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遗留议题。特别是中国应联合广大发展中成员继续推进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未决议题,防

止发达成员将注意力过多集中于反映其利益诉求的新议题而刻意忽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遗留的这些老议题,促进 WTO 改革谈判方案的平衡以及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谈判利益的协调。

第二类为中国可适度接受的改革议题,包括发达成员较为关切的竞争中立、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议题。在这些议题上,中国面临较大的对外谈判和对内改革压力,对此要理性分析并持开放心态,既不能因为针对中国就一概反对、完全拒斥;也不能全盘接受、处于被动。一些看似对中国不利的诉求,如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内容,有些也符合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中国应当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国内改革形成符合国际惯例并反映自身诉求的价值和规则体系,并以此与其他成员进行协商,作为中国在多边、诸边和双边层面规则谈判的出价,同时在谈判目标和方式上保持更大的灵活性。

第三类为中国应坚决抵制的改革议题,主要明确两条底线:一是不应将 WTO 成员的发展模式问题纳入 WTO 改革方案,应坚决反对将颇具针对性且又充满不确定性内容的“市场扭曲”议题纳入 WTO 多边规则;二是不应以“公平竞争”“竞争中立”之名行企业所有制歧视之实。WTO 改革应坚持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尊重现存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增加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

(三)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治理新需求作为推动 WTO 制度建设的一大契机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巨大冲击。根据 WTO 官方预测,2020 年国际货物贸易将因新冠肺炎疫情下跌 13%~32%,这一降幅可能会超过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贸易衰退。同时由于实行运输和旅行限制以及关闭零售、餐饮和娱乐业,国际服务贸易也将受到严重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的重大影响凸显了 WTO 在维护贸易自由化方

面的重要性,也提出了 WTO 改革的新课题,中国可在其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第一,WTO 应在维护贸易自由化,特别是抗疫物资、医疗用品和生活必需品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应对疫情对本国公共卫生和经济社会的沉重打击,WTO 成员大量出台相关贸易措施。在各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中,包括对货物贸易的数量限制,特别是对抗疫药品、医疗用品、个人防护物资和基本生活品的出口限制措施;对产品标准和动植物卫生检疫的管制,特别是对活动物及其产品的进口限制和禁令;对服务贸易跨境流动的海关(边境)管控措施,如对关键技术人员、农业和工业从业人员的流动限制。上述贸易措施既对抗击疫情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可能违反 WTO 贸易自由化和非歧视原则,对重要供应链构成风险,并引发更大范围的经济保护主义。对此,需要厘清 WTO 现有规则对疫情防控贸易措施的规制性和有效性,并考虑在 WTO 发起与疫情防控贸易措施有关的专项谈判倡议。从 WTO 现有规则体系来看,目前各成员主要援引关贸总协定(GATT)1994 第 11 条“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及其例外、GATT1994 第 20 条“一般例外”、GATT1994 第 21 条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14 条(b 款)的“安全例外”,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等有关规定采取贸易措施,但这些“例外”条款的规定不够清晰明确,有可能造成滥用,导致以“例外”为幌子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多。对此,可考虑在相关 WTO 协定委员会讨论和澄清上述“例外”条款,并发起针对疫情防控贸易措施的专项谈判。中国可作为倡议者和发起国,邀请德国、日本、印度、巴西等主要医药用品制造国和出口国,以及美国、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等主要进口国,谈判拟定 WTO 项下的全球疫情防控贸易措施协定或倡议,全面、系统地监督各国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各项具体贸易措施。

第二,WTO 应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国际海运、空运受到巨大影响,国际运输通道出现阻隔,对贸易便利化造成极大阻碍。对此,中欧班列作为国际铁路联运的新型组织方式,具有分段运输的独特优势,因而全力承接空运、海运货源,持续保障跨境物资的运输,成为全球合作应对疫情、稳定国际经贸形势的战略通道。中欧班列沿线国家基本上是 WTO 成员,因而 WTO 可作为促进中欧班列合作的一大平台,在《贸易便利化协定》指引下,组织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签订新冠肺炎疫情下中欧班列的合作倡议,从提高班列通关效率、开通救援物资通道、增开重点地区班列线路等方面,进一步发挥中欧班列的贸易便利化优势,保障重要医疗用品和其他必需物资和服务的正常跨境流动,减轻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

第三,WTO 应优先推动电子商务规则谈判以应对疫情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发挥了核心作用,使电子商务成为各国应对经济冲击的一个重要解决方案,并可以通过提高经济竞争力来支持中小企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了达成 WTO 电子商务规则的重要性。对此,WTO 可推动成员为应对疫情达成部分优先共识,签订早期框架性协议,包括解决提供数据服务如数字支付和移动转账的交易成本过高、网络容量与数据扩展服务能力不足、通过电子商务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不充分、网络安全、价格欺诈、产品安全、网络采购和供应政策监管不足等问题,促使电子商务成为疫情后时代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的重要驱动力。

(摘自《新华文献》2021 年第 9 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

论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必须正确认识的几个基本问题

简新华

一、国有企业还要不要改革、朝什么方向改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就提出了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润留成、恢复奖金制度,到把“包”字请进城、实行承包制、拨改贷、利改税,再到转机改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改革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以股份制或公司制为基本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上市、三改一加强、抓大放小、有进有退、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再就业工程、利税分流、年薪制、期权制、稽查特派员制、独立董事制、建立国资委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债转股、国有股减持、股权分置改革等。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没有完全停止过,而且是改革的重点之一。为什么现在还会出现国有企业还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问题和争论呢?这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还存在突出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国有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经营状况得到改善,不仅在财政收入、就业、技术等方面支撑着改革和发展,而且支持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多方面的原因使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国有企业进入加速发展和效益提高的时

期。从经营领域来看,国有企业由几乎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行业都存在,转变为主要存在于公共品提供、自然垄断行业、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基础性产业。从企业制度上看,大部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国家统负盈亏的国有企业制度,初步转变为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从企业数量上看,1998年国有企业占比为39%,2010年下降到4.5%;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由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的196家下降到2011年的118家。从资产总额的比重来看,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例由1978年的92%下降到2008年的43.8%。现在国有企业的数量和比重虽然已经大幅度下降,但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实力大大增强。2002—2011年,国有企业上缴的税金总额由2926.8亿元增加到16803.9亿元,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由3.36万亿元提高到20.2万亿元,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由2636亿元上升到14989亿元。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依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如果没有国有企业的支撑,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情况说明,国有企业已经在管理体制、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重大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很不健全,初步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很不成熟和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也不规范,尤其是缺乏合理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高管权力过大、收入过高,离谱的高薪、过度的职务消费、贪污受贿、奢侈腐败、转移瓜分国有资产、掏空国企的情况层出不穷,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依然相当严重,“三公”开支过大,挥霍浪费现象比较突出,行政垄断的特征比较明显,缺乏必要的监管,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价格不协调;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垄断地位取得高额利润,国有企业的利润基本不向国家上缴或上缴的太少,国家或全民的所有者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体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所有只是名义上的,实质上变成企业所有、高管所有;国企应有的职责没有得到有效的履行,高管与职工、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过大,国有企业高管的职位甚至成为其他收入不高、难以再提拔升迁的党政官员退休之前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肥缺;国家投入过多,股票上市和银行信贷都向国有企业倾斜,投资决策严重失误,投资效率不高,经济效益相对较低,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主导作用特别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发挥不够。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有人认为必须深化改革,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但也有人认为这些是国有企业必然产生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以减少甚至基本消除国有企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可见,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原因和出发点的看法很不相同。

由于对中国改革的性质、方向、目标和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解决的途径等的认识和主张不一致,导致学界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看法存在重大分歧。

在主张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经济政治上都要全盘西化的人看来,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制对接,公有制是计划经济的基础,因此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然要求;他们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全民不全、全民所有等于无人所有、无人负责、委托代理链条太长、缺乏规范有效的激励监督约束机制、代理风险极大且无法防范、垄断经营、浪费严重、效率低下、腐败蔓延,甚至认为现在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也主要是垄断性国有企业造成的,只有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彻底改掉国有企业,这一切问题才能最终解决,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以前人们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现在在这些人眼里,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简直成了万恶之源,私有化似乎是灵丹妙药!

有人明确提出中国“十二五”计划时期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国有企业私有化,我认为这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主张。垄断行业私有化比国有化更糟糕,更不利于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公共品的提供、价格的合理制定、市场失灵的纠正、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就业问题的解决、共同富裕的实现,更会扩大收入差距、损害职工的地位和利益。国企私有化不仅不能解决高管过度高薪、工人弱势、贫富差距快速扩大的问题,还会再一次像俄罗斯那样导致极少数权势人物通过侵吞大量国有资产而暴富,并且使侵占的国有资产合法化,加剧已经相当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私有化的结果,会导致广大中国劳动者60多年积累的数以万亿计的巨额国有资产转眼之间化为乌有,落入极少数有权有势、惯于投机钻营者手中,使国有企业某种程度事实上存在的非法的高管所有制,变成合法的完全的高管私人所有制,私人寡头和跨国公司外国资本会轻而易举地攫取绝大部分国有资产和资源、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极大地削弱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使中国成为国际

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造成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财富外流、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产生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弥补市场失灵、保证基础设施和公共品供给、成功进行宏观调控、有效应对经济危机和各种灾难、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优越性丧失殆尽。

在认为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看来,通过相应的制度变革,公有制才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由于传统的国有国营的企业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以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和方向不是私有化,而是完善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我认为,由于国有经济比重已经比较低,而且存在继续下降的趋势,国有企业的制度也很不完善,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经济效益不高,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实惠也不多,的确需要进一步改革,但改革的方向决不能是完全私有化,而是完善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为走向共同富裕作出更大贡献。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经济基础和本质要求。上述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所有制本身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通过转机改制、实行规范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能够消除的。这种看法,我在《经济日报》1993年12月22日发表的整版文章《试析中西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及启示》、《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发表的文章《委托代理风险与国有企业改革》、外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一书中收入的文章《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结构》、上海《学术月刊》2000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改革以来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

的发展》中,都做过专门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国内外不少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兴旺发展,则是实践证明。

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中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只能是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不能有其他目标,更不能有社会目标,否则企业将产权模糊、目标多重、无所适从、行为混乱、效益低下、难以生存和发展,市场对企业的调节作用也难以发挥。人们往往也以此认为,国有企业除了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之外,必然还会承担部分国家或社会要求的责任,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必然效益低下,在市场经济中难以生存和发展。但是,按照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要想成为长寿型企业,不能只顾股东收益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而必须兼顾供应商、职工、销售商、消费者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甚至还必须考虑环境保护等公众诉求。只有这样,企业的各种经济关系才能得以维持和改善,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调动和发挥,才能得到消费者和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形成更有影响力的品牌,获得更大更持久的市场占有率。其实,利益有差别的共享能够带来和谐和效率的思想,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古希腊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家庭经济管理的,色诺芬在他的经济学专著《经济论》(关于财产管理的讨论)中提出,“为什么在有些家庭里,几乎所有的仆人都戴着脚镣手铐,可是他们总是想逃跑;而在另一些家庭里,他们根本不受什么束缚,却都高高兴兴地工作,并且愿待在他们的岗位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色诺芬写道:使人“能分享你的好东西”,“这是最好的使人产生忠心的办法”。虽然利益共享或利润分享中,股东应该得大头,否则将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使人们不愿意投资,这就会牺牲经济的发展和效率。因此,国有企业在主要实现国有

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全民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可以适当完成必要的社会任务,不能以此认为国有企业肯定搞不好。

二、改什么、应该怎样改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改什么、怎样改?有人认为很简单,就是全面彻底私有化,至少也要从竞争领域完全退出。当然,也有人指出在私有化和退出过程中,要防止自卖自买、低价贱卖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给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原有的职工以必要的安置和合理的补偿。前面已经说明,这是一条错误的危险之路。即使在私有化过程中,按照人头平分国有资产,表面似乎很公平,老百姓和国家也可能取得一定的收入、得到一定补偿,由于广大劳动者数量庞大、分散持有少量的分到手的国有资产,既不可能拥有定价权,也不可能以此取得较多的收入,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廉价卖掉,老百姓和国家会永久失去这些国有资产,短期所得到的有限收入将远远赶不上私有化造成的长期巨大损失。

也有学者认为必须改变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大力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我是赞同后一种观点的,中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制度,克服国有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继续支持私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促进走向共同富裕。

国有企业如何深化改革?我认为,应该合理采取以下措施:(1)采取适当的措施,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开展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支持和鼓励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更好更快地发展国有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控制作用。(2)完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的最高机构应由国务院的机构改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机构,直接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管,真正向全民负责,履行国有资产所有

者的职责,有效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完成必要的社会任务。(3)健全国有企业制度特别是治理结构,完善国有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制度,形成合理有效的激励监督约束机制,使工会独立化,切实发挥职工和党委会的监督作用,改变国有企业缺乏必要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事实上的“高管所有制”“部门或企业所有制”“独立董事既不独立也不懂事只是享受高薪”的现象,有效防范委托代理风险,克服官僚主义、以权谋私、鲸吞国有资产、贪污腐败现象。(4)逐步减少或取消国有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垄断,消除部门特权和既得利益,促进国有企业主要依靠改进技术、提高质量、搞好服务、开发新产品、善于经营、科学管理而赢利。从事自然垄断行业、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企业,在发挥保障国计民生和国家各方面安全的同时,也要尽可能通过相应法规(产业规制),在供给、价格、数量、质量等方面,合理限制国企的垄断性,尽可能发挥市场的作用,在民营企业能够进入的领域应该允许进入,更好地减少或消除垄断的不利影响,克服垄断可能产生的弊端,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提供价格合理的优质产品和服务。在竞争性领域,给国企和民企同等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让民间资本进入所有竞争领域,消除国企不必要的垄断。(5)切实履行国有企业为全民和国家谋利益的职责,法定国企必须上缴合理比例的利润,让利于民,用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真正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进行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维护国计民生、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缩小收入差距、改善人民生活 and 走向共同富裕做出更大贡献。(6)法定企业高管与职工收入差别的合理倍数,适当缩小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收入的差距,进行必要的成本控制。根本不用担心因此没人愿意做国企高管,不要担心留不住管理人才。不能认为赚更多的钱是国有企业高管的唯一追求,收入、待遇、

人力资本增值、事业、荣誉、成就感、事业心、奉献精神都是国有企业高管追求的目标。连私营企业主都要做“光彩事业”、慈善事业，难道就不能鼓励国有企业高管有奉献精神吗？在保持国有企业高管必要、合理的高薪前提下，不要害怕没人愿意做国有企业高管。现在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或主题是使国有企业彻底的市场化、方向是公众化、市场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内涵不是十分明确的、可能给私有化留下后门的、值得深入探讨的主张。什么叫国有企业市场化？如果是指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市场化，即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面向市场、参与竞争、优胜劣汰，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部分在自然垄断行业、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不能完全市场化的。即使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不能“彻底的市场化”，多少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否则，就不是国有企业。假若国有企业市场化是指国有企业产权的股份化、证券化、公众化，即国有企业的产权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转让、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主要由公众持股，存在的问题可能就更大。国有企业要实行公司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其资产肯定必须股份化、证券化，而且应该可以转让，但必须以保证国有资产的控股地位为前提。如果无限制的自由买卖，很可能使国有资产失去控股地位，国有企业就可能演变成以私有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甚至转变为私有企业。股份公众化虽然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掌握更多的资金、提高控制力、建立更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但同样也要以保持国有资产的控股地位为前提。否则，公众化就可能成为私有化的代名词。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上，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必须正确处理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关系。我认为，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必

须遵循的原则应该是：在总量上，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该是共同发展、“国进民也进”的关系；既不是单一的“国进民退”，也不是纯粹的“国退民进”，而是两者都发展、数量都增加、规模都扩大。在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上，需要扭转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改变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即“国退民进”的局面，但绝不是要采用限制、改造、取缔、消灭私有经济的方法，而是采取合理的措施，使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从而提高国有经济的比重。在产业部门的布局结构和产业链分工协作上，在更适合国有企业的领域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在更适合私有企业的领域则以私有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继续有进有退，但不人为强求退出竞争性领域，能够在竞争性领域生存和发展的国有企业，应该让其做大做强；合理放开对非国有企业的限制，让私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进入更多产业领域，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更好地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作用。在产业链和生产经营的分工协作上，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应该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相互配合、互利共赢，形成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群，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作为“龙头老大”的导向作用和私有企业经营灵活高效的优势。在政策措施上，特别是在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应该都平等享受所谓“国民待遇”，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既不能歧视私有企业，也不能让国有企业承受太多的社会负担，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实现主要应是合理上缴利润和必要的监控，而不是让其承担许多社会责任。

（摘自《经济研究参考》2021年第2期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简新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新阶段 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都 阳

人口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事关长远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对于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已于近期公布。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是举全国之力对基本国情进行的一次重要调查,这次人口普查恰处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更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要看到的是,人口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要素,但一直以来,因为人口被理解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慢变量”“长期变量”,其社会关注度显然不如一些短期的指标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在社会公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无疑对于纠正这一偏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既有利于对人口发展态势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也有利于以后在完善人口相关的政策时减少阻力,从而加快政策推进力度。

辩证看待人口变化

从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看,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需要辩证看待。

其一,低生育率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生育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此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而国际上一般认为2.1

的总和生育率为更替水平,低于2.1称为低生育水平。要看到,低生育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此次人口普查对低生育水平的确认对于预测未来的人口发展走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纠正以往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同时对于尽快完善人口政策、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也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测,我国将在未来迎来总人口峰值。2020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较2019年减少了265万人。在低生育率下,我们很容易预期未来出生人口会进一步下降,我国也将在未来迎来总人口的峰值。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对劳动供给形势形成转折性影响,随着总人口达峰,人口因素也将对总需求形成转折性的影响,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变化。

其三,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任务。此次人口普查进一步确认了未来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根据最新数据,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91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3.5%。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就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从数据看,我国将很快

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因此,尽快形成全面、系统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已迫在眉睫。

其四,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逐年缓慢减少。如果我们把16岁至59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的话,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速度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虽然目前尚未公布16岁至59岁年龄组人口的信息,但普查数据显示,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为89438万人,与2010年的93962万人相比减少4524万人;同时,15岁至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2010年下降了6.79个百分点。未来应对劳动供给迅速减少的挑战将比较艰巨。

此次普查数据也提供了一些超预期的结果,比如,0至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较2010年上升了1.35个百分点,虽然有赖于更详细的数据来分析增长的原因,但这一增长可能主要来自于生育政策调整所带来的长期积累的生育意愿释放。此外,性别结构改善,特别是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正面因素。比如,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这说明我国人口质量和素质不断提升,将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基础。

系统制定人口政策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加强人口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战略和政策,是我们当下必须要做好的工作。鉴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提供了最新、最准确的人口信息,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尽快地完善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各项政策,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一,要尽快完善人口政策。从国际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且鲜有经济体在生育率下降后能重返上升趋势。但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具有的典型性特征是:目前的低生育水平领先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生育率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

均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的低生育水平的形成存在一些个性化因素,也意味着通过调整人口政策遏制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是可能的。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可以满足不同家庭多样化的生育意愿,形成更自然的家庭结构。同时,将相关的社会政策着力点放在降低生育、抚育的成本上,也有助于遏制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第二,要以系统性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1.91亿人,占全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比重超过了四分之一,这意味着立足自身经济发展,筹措养老资源和构建养老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石。“广覆盖、保基本”仍然是建设养老体系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与此同时,“未富先老”的特征仍然明显。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与其他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均养老资源仍然严重不足,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基础。未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并成为影响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对扩大劳动供给规模、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将可能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要改变以往仅仅从改变人口政策、养老体系等方面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局面,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储蓄与消费、宏观经济平衡等指标的相互关联性,以系统性的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第三,要科学应对人口因素在需求侧产生的影响。人口达到峰值后,如何应对人口总量下降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并不多,对我国这样的经济体量和人口体量的大国的影响更具有特殊性。对此,我们要抓紧研究总人口达峰后在需求侧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加快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把人口数量减少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降到

最低。在人口发展越过总量变化的转折点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均等的程度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应会更加明显,应该在相关领域加强深化改革的力度,以对冲人口因素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

总之,人口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人口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人口普查是摸清人口“家底”的重要手段。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产生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形成了宝贵的数据资源。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人民积极参与所形成的成果,对于了

解基本国情具有重要意义。人口普查形成的庞大的数据资源含有极其丰富的信息,应该鼓励相关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加强数据的开发利用,使这一宝藏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科学决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摘自《经济日报》2021年5月26日)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都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接第27页)谋划未来数字产业化的方向,科学引导行业和企业的发展;二是要构建“政产学研用”创新共同体,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以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引领创新,实现从跟随式发展向引领式发展的转变;三是要扩大数字产业化中试基地和应用场景实验室建设的规模,畅通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解决数字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的堵点和断点,打通产业链和创新链。

第三,促进数字产业协调发展,统筹全国数字产业空间布局

数字产业的空间布局将是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以数字产业的合理空间布局夯实未来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区域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东中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呈梯度递减态势。对此,需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划数字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加大中西部地区建设“新基建”的力度,弥补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的差距,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发展格局。

第四,实现产业的数字化升级,重点在加快健全工业互联网的生态系统

产业数字化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引擎,传统产业需借助工业互联网的生态系统实现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体而言,需转变思维,共建工业互联网生态系统,大力鼓励并支持实体经济的领军企业成为工业互联网生态系统的主导者和构建者;创新生态合作模式,使生态系统的各参与主体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进工业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夯实工业互联网生态系统建设的微观基础;加快数字化软件服务的更高层次开放,实现补链扩链强链并更好承接创新链转移,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

(摘自《经济日报》2021年5月21日)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陈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全球供应链的演变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

朱晓乐 黄汉权

近年来,受逆全球化回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调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世界各国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而且给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标志的供应链带来了重大冲击,使影响全球化的长期因素近期化,从而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调整步伐。密切跟踪全球供应链演变动向,分析研判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采取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对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供应链的演变趋势

2020年以来,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前期,受疫情影响,中国国内大部分企业停工停产,全球供应链因中国部分产业停摆而断裂。后期,疫情在全球蔓延扩散,主要发达国家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实施了封国封城,关闭商场和企业,全球供应链受到二次冲击。目前,随着疫苗投入使用,全球疫情有所缓解,全球供应链也逐步得到恢复,但预计很难回到过去的情形。综合研判,受疫情影响,“逆全球化”趋势将加强,至于“逆”到什么程度和多长时间,尚不好判断。“逆全球化”必然引发全球供应链调整。此次疫情“压力测试”表明,全球供应链缺乏弹性韧性,是较为脆弱的。疫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引起了各国决策者、企业界、学术界的深刻反思。从发展趋势看,全球供应链将朝着

近岸化、分散化、区域化的方向演变。当然,这些趋势在逆全球化回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中美贸易摩擦等背景下已经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催化剂,对这些变化起到了加速作用。

(一) 供应链近岸化

“二战”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发达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离岸外包成为一种趋势,由此推动发达国家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制造业回流计划,但效果不太理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发达国家起初都出现了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短缺问题,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学者认识到制造业过度外包可能引致的风险。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把制造业回流和掌控“经济主权”挂起钩来,表达了推动供应链近岸化(本土化)的决心。一些迹象表明,鼓励和支持在国外的企业回流本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共识,这会对全球供应链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二) 供应链多元化

如果说中美贸易摩擦使跨国企业觉得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并无大碍的话,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让它们深化了“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认识,分散供应链风险已经成为部分企业的迫切需求。已

有部分国家和跨国企业着手评估供应链效率和安全的平衡,制定了生产地点分散化、减少对单一供应链依赖的方案,一些国家和公司甚至付诸行动。日本政府明确在其“供应链改革”项目中,拿出230多亿日元用于帮助企业将在中国的一部分工厂转移至亚洲、非洲等地区,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根据东京商事研究公司对2600家日本企业进行的调查,在日本政府出台这一政策后,有37%的公司愿意把部分生产基地迁出中国。

(三) 供应链区域化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代之而起的是毗邻国家和地区间的区域性贸易协定增多,区域之间经贸合作加强,供应链呈现明显的区域化态势。据麦肯锡公司测算,2013年以来区域内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提高了2.7个百分点,目前欧盟28国和亚太地区超过50%的商品贸易在区域内进行。事实上,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阴霾下,各种区域间经贸合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重新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日本在美国明确退出TPP后,推动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由于全球贸易更多地转向区域间的经贸,未来全球供应链的组织模式可能出现“三足鼎立”的格局,即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组成的北美供应链网络体系,由德国、法国等国家主导的欧盟供应链网络体系,以及由中国、日本、韩国等为核心的亚洲供应链网络体系,三大体系内部自成体系,形成相对闭环,每个体系与外部也存在部分供应链关联。

二、全球供应链演变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中国产业链安全与经济全球化走势和供应链重构密切相关。全球供应链重构势必对中国产业生产和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扰乱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轨迹,需

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 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

随着中国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大关,越来越靠近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基于发展中国家地位享受的优惠和差别待遇可能减少甚至被取消。同时,近年来主要经济体贸易冲突加剧,其背后是规则制度的冲突,世界经贸规则急需改革调整。中国作为长期贸易顺差国,对外开放政策和内部体制备受各国关注。由于担忧中国产业升级对美欧日等国的高端产业构成威胁,美欧日等国积极推动WTO改革,试图建立以“三零”为框架的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产业补贴、金融服务等方面仍需改进,如果不能与美欧日等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中国有可能被排除在发达国家构建的新贸易体系之外。

(二)“在中国生产,服务中国市场”将成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布局的主要考虑

在全球供应链近岸化、多元化、区域化的影响下,跨国公司和国内部分企业将一些生产线迁出中国,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根据美国供应链咨询公司Sourcify的调研,为减少疫情影响,发达经济体都在寻找新的替代供应商。可以预见,“中国+1”或“中国+N”将成为跨国公司布局生产基地的战略选择。具体来说,一方面,为规避生产过度集中的风险,跨国公司可能把一部分产能布局在中国以外的一个或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而形成对中国的出口替代。另一方面,中国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及配套能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犹如巨大磁石场使外资企业难以离开中国,它们仍会把部分产能留在中国,形成“在中国生产,服务中国市场”的格局。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不会动摇。

(三) 产业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受到影响

根据产业转移理论,中国东部地区产业在

转型升级过程中,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要素成本低的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区域梯度接续发展。然而,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加上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中国东部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地是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这使得中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导致其工业化进程缓慢,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四)中美供应链“半脱钩”风险加大

虽然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中美贸易的根本性问题仍没有解决,美国仍对从中国进口的37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而且不断升级阻拦中国高科技供应链与美国企业的联系。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美国政府仍要求成员国在《瓦森纳协定》中追加对可转为军用的半导体基板制造技术以及军事级网络软件的出口管制限制,以阻止中国获得半导体发展所必需的设备和技術。在疫情暴露美国防控物资和医药原料短缺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推动中美供应链“脱钩”更容易得到民粹分子的呼应。对中国而言,由于担心美国高科技断供,不得不作出“备胎”预案,减少对美国高科技的过度依赖。

三、全球供应链演变对中国细分行业的影响分析

全球供应链调整对中国不同行业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可以从进口和出口两个维度来分析。进口方面主要集中于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出口方面主要是终端产品,这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有关,即中国既需要从全球进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又需要向世界输出大量的终端制成品。

(一)基于进口视角的分析

根据从国外进口产品类型和对外依存度高低,可将中国制造业分为以下类型:一是对外依存度较高、需要大量从海外进口原材料(能源、矿产)的行业,典型的如焦炭和成品油、贱金属制

造,二者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17.05%和10.17%。2018年,中国进口矿产品达267.22亿美元,占全部进口的5.68%;进口原油达4.62亿吨,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二是对外依存度较高、需要大量从海外进口制造环节中间投入品的行业,主要是产业链条较长、技术复杂性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典型的如计算机及电子信息业,对外依存度高达16.07%。此外,还有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其他运输设备等装备制造业。这些产业全球化程度较高,产业链分工细化,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上游环节;中国则主要集中在中下游环节,对主要发达国家进口依赖较大。2018年,中国进口机电产品2960.45亿美元,占全部进口的62.98%。三是对外依存度相对较低、部分原材料需要从海外进口的行业,典型的如木材及木材制品业。四是对外依存度低、部分中间投入品需要从海外进口的行业,主要是医药行业,需要从海外进口高附加值的中间药以及一些技术复杂性较高的医药设备等(见表1和表2)。

在对外依存度高的行业中,第一类行业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矿产。中国原油的三大进口国是俄罗斯、安哥拉和沙特,矿产资源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智利等矿产资源大国,而木材等原材料则主要来自俄罗斯、巴西以及东南亚等国。由于这类产业的冶炼、加工、制造产能主要集中在中国,且以内资企业为主,中下游产业根植性较强,全球供应链虽然有风险隐患,但相对安全。对中国供应链造成影响的主要集中在高对外依存度制造业的第二类产业,即对外依存度高、需要进口主要上游制造环节零部件和产品,主要有计算机及电子信息、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和其他运输设备,因为中国的进口主要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目前这些国家疫情仍在蔓延,企业正常生产面临较大威胁,且美国以泛化的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中国出口管制,甚至采取“长臂管辖”手段胁迫其他国家跟随,可能对中国这些行业供应链造成较大影响。

表 1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对外依存的不同类型(%)

	主要依赖原材料、能源矿产	主要依赖上游制造环节零部件和产品
对外依存度高	纸及纸制品、焦炭和成品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橡胶和塑料、非金属矿物制品、贱金属制造	计算机及电子信息、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其他运输设备
对外依存度低	食品饮料烟草、纺织服装皮革、木材及木材制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金属制品	医药

表 2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中间投入对外依存度情况(%)

食品饮料烟草	2.98	非金属矿物制品	6.33
纺织服装皮革	3.15	贱金属制造	10.17
木材及木材制品	5.10	金属制品	5.23
纸及纸制品	7.32	计算机及电子信息	16.0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	4.89	电气设备	6.51
焦炭和成品油	17.05	机械设备	6.3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7.13	汽车	4.33
医药	3.67	其他运输设备	6.28
橡胶和塑料	6.36	家具	5.80

(二) 基于出口视角的分析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销售对外依存度 = 出口交货值/销售产值)总体呈下降趋势。2008 年中国制造业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为 19.03%,到 2016 年逐步下降至 11.29%。除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有小幅增长外,绝大部分细分行业的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9 年,在稳外贸、稳外资等“六稳”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对外贸易逆势增长,制造业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回升至 11.64%,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反弹,总体下降的趋势不会逆转,因为今后中国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而且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将成为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

根据中国制造业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大小,基于 CIC2 位码行业,可以把中国制造业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超过 40% 的行业,主要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08 年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高达 67.97%,此后虽然逐年下降,但 2019

年仍然超过 50%。第二个层次为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在 20% 至 40% 之间的行业,主要的行业为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第三个层次为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在 10% 至 20% 之间的行业,典型的行业为仪器仪表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以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第四个层次为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在 10% 以下的行业,典型的行业为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汽车制造业等。

在产品销售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行业中,由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等行业的产品主要出口至美国、欧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受关税、国家安全及全球供应链调整等因素影响,行业发展不确定性增大,生产经营面临较大风险。其他行业虽然其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也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但由于产品销售对外依

存度不高,行业发展总体是安全的。

四、应对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对策建议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顺畅运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面对全球供应链近岸化、多元化、区域化的变化趋势,要采取积极稳妥的应对措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和适应全球供应链调整的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竞争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一)着力稳定外贸产业供应链

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外贸政策工具箱,降低港口、检验检疫等各环节收费,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加大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支持,加大税费减免力度,为其将本土关键零部件生产线迁至中国开通绿色通道,助力解决建设新厂和生产线等方面的困难,尽力破除外商投资落地的隐性障碍,帮扶受疫情较大影响的外资企业解决困难。重点保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地区的外贸产业链,重点关注汽车、电子信息、机械和装备制造等产业链长、国际化程度高的行业,重点留住产业链头部企业和供应链核心企业,打通物流不畅、成本高企等产业链痛点堵点,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

(二)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预警机制

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制定产业政策、进行经济干预最基本的出发点。要设立分领域产业链协同发展和预警信息平台,建设产业链安全数据库,实时监测中国企业的生产、库存、中间产品进出口数量、价格等情况。建立应对产业链断裂的反应机制,在高风险行业支持发展国产替代,对于暂时找不到替代的行业,积极采取措施稳定国外上游企业的关键零部件供应。引导企业等经济主体围绕特定产品建立产业链组织,完善产业链协调机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沟通。

打破地域、企业界限,强化上下游企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精准帮助那些因为疫情冲击受到严重影响的企业,提高供应链间的协作效率。

(三)优化调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比如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至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符合产业转移规律,顺应了全球供应链近岸化、多元化的演变趋势。对此,要顺势而为。一方面,引导外迁企业在转出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的同时,留住研发设计、总部运营中心等高端环节,转型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推进中国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构建以我为主的供应链分工体系,提高对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确保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引导制造业企业加速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进入欧美市场,通过占领高端市场继续深度嵌入欧美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同时,统筹处理好产业外迁和对内转移的关系,着力提高中西部地区精准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批基础条件好的中等城市,打造高水平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引领支撑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宏观政策调控,发挥中国不同区域产业和资源禀赋的互补性,优化区域供应链布局,防止部分产业链过快外迁,培育中国的大市场和价值链,以推进经济内循环的有效升级。

(四)以技术创新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一个国家要确保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和价值链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根本上要靠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疫情防控时间拉长,特别是面对美国的技术打压,国内部分产业链因零部件库存耗尽面临断供风险,如近期汽车芯片就出现了全球性短缺现象。为此,一方面,要支持国内企业做好“备胎”方案,开辟新的技术创新路径,(下转第56页)

从国家本位到市场化： 德国公共服务的发展与启示

杨 炼

德国是一个具有国家主义的深厚传统的国家，在国家主义影响下，其公共服务供给长期由国家承担，实行公共服务的“国家本位”。德国很少考虑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所有的参与者——政治家、官僚、工会会员以及其他——过去而且现在都不那么乐意将竞争性的因素和市场因素引入到改革概念中，而且也不支持带有这些色彩的试验。”德国公共服务在从国家本位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秉持温和型改革的思路，采取相对稳健的改革策略，将公共服务逐步推向市场化，从最初的政府购买国有企业、直接参与调节市场，到推进以社区公有为主导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公共服务改革成效显著。对典型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综合比较（含人类发展水平、公共需求满足程度、收入再分配与公共服务的公平度、长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负担和可持续性五项指标）的结果表明，德国位居第一，排在英国、美国、瑞典、法国、新加坡等国家之前。探讨德国在公共服务改革的历程及经验，可以为推进我国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一、德国国家主义的产生与公共服务的发展

作为一个后进型的工业化国家，从19世纪中期开始，德国开始工业化进程。随着由纺织业向以铁路建设为重点的重工业转向，德国

工业发展水平后来居上，在一战前跃升为工业发达国家。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并没有为德国社会各阶层带来利益的同步发展，其中最核心的是工人问题。大量的底层工人得不到最基本的权益保障，“诸如工业化带来的各种频繁的工伤事故，没有保障的工作，城市化社会结构下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带来的住房问题等，都成为引发各种社会危机和冲突的根源。”从1873年开始，德国发生了持续20多年（1873—1895年）的经济危机，社会生产生活进入大萧条，工人运动不断发展。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严峻经济社会危机，以阿道夫·瓦格纳、古斯塔夫·施莫勒等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主张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广泛干预。阿道夫·瓦格纳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国家应对经济实施无所不包的干预”，“帝国政府不仅应积极推行社会福利与保险政策，而且直接的国家主导权和一种无所不包的制度化控制体系，应首先服务于这个国家经济和强权政治上的发展，并阻止经济与社会危机。”古斯塔夫·施莫勒等则提出了“中欧集团”理论，“通过这个集团，德国将以一个得到扩张、实行自给自足的大经济空间作为他民族力量不可缺少的基础……并作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大国，出现在与其他列强进行经济谈判的桌子上。”在新历史学派的影响下，19世纪80年代，德国

首相俾斯麦创立了德国的社会保险体系,保障公民社会福利成为德国国家社会职能的重要内容。新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张通过公平分配来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从而为德国“社团主义”传统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德国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883年到1911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中,德国先后通过了《疾病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险法》《老年和残废保险法》《遗族保险法》《职员保险法》等社会保险立法,并汇编为《帝国保险法典》。通过社会保险立法,作为德国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服务得到了迅猛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使福利国家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德国开始探索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将一些公共服务项目交给非政府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来承担。1982年,推行“新保守主义”路线的科尔政府上台之后,德国开始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科尔政府在1985年提出,“在国家利益不受损害的范围里,应该减少对国营事业财产的干涉。从国民经济上退出不需要的国家活动,以导向市场构造。”这一时期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从1982年科尔政府成立至1990年10月两德统一之前是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州政府或地方政府为中心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限制公营企业活动和扩大私人资本的比重,通过出售公有股权,实现公用事业民营化。1990年两德统一后,公共服务市场化进入第二阶段,主要以1980年代尚未民营的公营事业或者是部分民营化的公营事业,及联邦邮政、联邦铁路等联邦出资的公用事业为对象。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派思想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影响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派在吸收新历史学派强调“秩序”的思想基础上,主张将秩序和自由结合起来,“目标是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把自由主动精神同通过市场经济成就得到保证的社

会进步结合起来。社会市场经济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但辅之以经济保证的经济制度,它的意义是将自由的原则同社会公平结合在一起。”因而他们的思想也被简要概括为“自由+秩序”。具体来看,社会市场经济学派思想对德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竞争和结社自由。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德国政府注重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防止政府一家独大,平等对待公立服务机构、非营利组织和企业,鼓励基金会、社会公共服务提供机构、评估机构、联合会等非政府机构的成立和运转,积极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实现政府购买。为了促进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竞争,德国政府还强调各种性质的公共服务提供机构的平等地位,保障民众的自由选择权。德国的公共服务改革成效是显著的。在德国的公共服务生产中,社会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提供服务的数量占到了青年之家的4/5,日托幼儿园的2/3,所有老年之家和失去能力人之家的半数以上,德国全部医院的1/3。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派强调在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筹资责任和监管责任。因此,德国政府通过立法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为强化监管责任,德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各类社会保险的立法、政策制定、监督、管理,并与社会团体充分合作,将公共服务由传统的操控管理转为目标管理,以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水平。

二、德国公共服务从国家本位向市场化转变的基本特点

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和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德国的公共服务在向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中,注重改革措施与德国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有机融合,并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了较合理

的分工合作体系。良好的合作体系主要依靠德国统一的制度性框架来实现,通过建立合作体系,既保证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又保证了公共服务的统一和公平。在德国,社会组织(包括各种注册协会、民法中的非营利基金会、非营利私人有限公司和非营利合作社)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享有自治权。政府通过保留制定政策和规则的职能,构建社会公共服务的基本制度框架,并通过立法、司法、协调等方式保证社会政策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取向,具体的矛盾和利益则分散到各社会团体。德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本原则是“补助原则”。所谓“补助原则”,是指只有在没有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时,政府才能自己提供,否则应当主要由社会组织来负责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德国《社会保障法》规定,政府有义务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以便有效实施其工作,这一合作也应当以伙伴关系为基础。这些规定保障了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中大量存在着社会组织和私立的营利性机构。

二是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充分考虑到了历史和国情的有机结合。通常情况下,德国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主要有委托、采购、准市场化或第三方治理三种方式。由于福利国家的传统,德国各社会阶层对市场化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普遍没有很高的积极性,对竞争招标等市场方式的效果有着很深的疑虑,加之德国大多数社会组织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有限,主要依靠会员的会费和捐赠等维持运作,因此,德国在公共服务改革中没有强制推进市场化改革,面向社会大众、以鼓励竞争为特点的招标方式在德国并不普遍,德国政府也不要求政府在向社会组织采购公共服务时一定要遵循平等协商原则。政府担心,一旦开始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过程,如果不能体现政府的决定与主导权,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将难以得到保障,公共服务的短缺问题将难以解决。

三是注重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监管。德国对公共服务市场化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森将其评价为:“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把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的倾向。”德国注重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监管,通过实施价格管制和建立管制网络模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综合管制机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四是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注重法制化。德国是世界上法律法规最完备的国家,注重通过法律来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德国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国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通过法律,德国规定了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标准,确立了公正的公共服务分配机制。为防止部门垄断,德国法律明确,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必须遵循经济原则。德国也强调“社团主义”在福利国家中的地位,1922年的《帝国福利法案》明确规定,公共机构与私营机构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时享有同等地位。1951年的《社会保障自治管理法》规定,社会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应当体现民主与自治原则,由各种社会保险协会自我管理。2004年的《社会安全法》进一步规定,德国联邦政府负责政治性事务的安排,并在联邦层面就工作方法、形式、内容和价值导向方面帮助社会公共服务提供者,各州主要负责为地方社区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必要措施,帮助其履行法律任务,同时对机构的建立及覆盖地区需要的社会公共服务进行管理。2004年的《社会保障法》修订了政府与社会公共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用绩效导向补偿原则取代了最初的成本偿还原则。为家庭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非公共机构,无论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独立的机构,都会得到地方或各州政府的资助。

德国公共服务改革仍处在渐进式发展之中。对德国而言,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最终发展走向与以下几个因素有直接的关系。首先,

是维持、扩大还是削减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的数量?其次,在公共服务提供中,是否应该保持传统形式?是由公共基金来支持公共服务,还是应该由消费者直接支付为他们提供的服务的费用?再次,某个特殊的社会问题是否仍然被视为一项公共责任,以公共服务的形式进行实施?即公共服务范围的构建。

三、德国公共服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目前全国社会组织有89万多家。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功能转换以及规划设计都在逐步走向深入,保障社会组织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但与此同时,与社会组织有关的法律规范的框架并不完善,法律位阶层次较低、稳定性欠佳,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税收制度以及培育孵化机制等都存在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表明我国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整体欠佳,存在较大的改革发展空间。

尽管中德两国之间政治制度迥异,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也大不相同,但从社会组织 and 公共服务发展的局部环境来看,两国在文化传统、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政策方面又有类似之处。首先,从文化传统来看,我国与德国文化底蕴深厚,都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强调国家中心。其次,在经济体制方面,我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二战后德国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是,“自由竞争与政府控制并存,经济杠杆与政府引导并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因而也被称为‘政府引导型市场经济’”。再次,德国推行的是均衡发展的社会政策,有别于英美国家的激进型改革方式,其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实行的是温和型改革,注重为公民提供基本生存所需。同样,以“民生为本”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的主要路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推进我国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发展进程,激发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活力,充分发挥其作用,德国的经验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一)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规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购买法律制度体系

2014年通过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明确了政府购买的服务包括政府自身需要的服务和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纳入了政府采购法范畴。我国现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设计以节约财政资金和预防腐败为主要目标,过多强调“完全市场竞争”和采购程序限定,忽视了对采购需求、履约验收和结果评价的管理。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的立法程序,推进程序制度建设。同时,地方政府应结合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经验,以《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为依据和基础,出台相应的配套制度与实施细则,既保证与法律法规的高度统一,又充分体现因地制宜的灵活应变,逐步建立起以法律为主导、以地方法规为补充,内容完备、条块清晰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体系。

(二)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好的伙伴关系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一种组织之间的势均力敌的理想状态。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好的伙伴关系,需要明确各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首先,应对社会组织的准入资质、经费来源、服务准则以及争议解决等制定具体的规定。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改革,探索加快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制定社会组织分类登记的标准和具体办法。其次,加快推进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

明确责权、依法自主、发挥作用”。受长期计划经济影响,在社会领域,传统行政性社会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并存,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政府供给存在路径依赖。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社会组织还没有完全成长到可以独立承担政府部分职能并产生替代效应,对行政体系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要进一步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完善税收制度、财政金融制度和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机制,增强社会组织内在活力。

(三)推进社会组织自身专业建设

专业化是社会的核心竞争力,对提高社会组织服务质量有重要影响。完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引导社会组织自主按章程开展活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负责人管理责任追究和资金管理 etc 制度,推进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合理制定职责清单,将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和其他事项,转移给社会组织。

(四)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多元化监督机制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以财政部门的资金监督为主的一元化监管模式存在诸多缺陷,监管职权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监督力量不足,专业人才缺乏。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公共服务购买者(政府)的公平公正,服务提供者的自律以及健全的监督体系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保障。从外部监督来看: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独立、专业和多元化的外部监督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三方评估。人们通常认为第三方评估更具有专业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其次,是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等的监督作用。再次,是建立专家监督机制。内部监督主要包括财政部门对财政购买资金使用的监督,重点是政府采购的过程以及购买服务的部门对服务的质量、数量的监督。

(摘自《公共行政》2021年第5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作者简介:杨炼,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博士。

(上接第50页)积极寻找国内可替代的供应商,并为国内首台套设备以及新技术、新材料打开市场应用创造时间窗口。另一方面,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各方面科技力量,联合攻克面临断供风险、关系产业安全的“卡脖子”技术和产品。用好各级财政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和引导基金,支持制造业技术改造、共性技术研发、核心零部件生产和节能设备更新,进一步降低供应链高端环节的对外依存度。

(五)积极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

虽然构建全产业链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但是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不只是关系到一两个国家的事。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加强国际合作,保持与主要贸易国的沟通交流,

协商解决供应链顺畅运行面临的痛点和堵点。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同沿线各国建立中高端水平的自贸区,认真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定和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主动构建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减少供应链协同发展的制度障碍,提高全球供应链组织效率,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摘自《改革》2021年第4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作者简介:朱晓乐,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书推介

《马克思货币哲学与当代现实问题研究》

欧阳彬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9 A811.66/25

本书分三个部分：一是从概念、文本、历史、当代价值等维度阐释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二是梳理从古希腊哲学到后现代中的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货币哲学思想；三是主要从经济哲学的维度去反思和批判现代货币与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现代精神文化的发展方向、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之间的内在勾连，通过具体探讨现代货币与国家权力、语言结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提出货币并未决定现代社会，而是货币具体化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也并未决定货币，而是现代社会利用货币。

《读古人书之〈孟子〉》 邵永海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B222.5/32

本书选取《孟子》的经典段落，归纳为八个主题，包括人性善与仁爱之心、仁政的理念与设计、致君尧舜、义利之辨与处世哲学、人的尊严与士的使命等。

《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美）朗佩特著 华夏出版社 2019 B712.5/44

劳伦斯·朗佩特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施特劳斯工作中持久重要的东西。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在于，他重新发现了现代启蒙之前所有哲人践行的写作艺术，他推动产生的新的哲学史，能够重获西方传统中那些伟大思想家和诗人的真正教导。

《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 牟钟鉴著 人民出版社 2018 B929.2/24

本书共十二章，内容包括：《宗教社会论》《宗教五性论》《宗教法治论》《宗教适应论》《宗教文化论》《宗教和谐论》《宗教促进论》《宗教生态论》《宗教传统论》《民族宗教论》《民间宗

教论》《温和无神论》。

《保罗与马克安：一种思想史考察》（德）马克斯·文森著 华夏出版社 2018 B978/28

本书以一个具体概念在公元1—2世纪这个时段的复杂演变为主轴，由此引出马克安独特的思想贡献，而马克安的再发现或者说对马克安的这样一种新颖解读又深化了我们对早期西方思想史的理解，进而对西方学界普遍接受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作者以提问的方式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经典的成书过程并进一步反思与此相关的一些正统观念得以确立的缘由。各章的叙述兼顾文本与思想史两方面的内容，作者以娴熟的笔法将细腻的文本分析与宏阔的思想史考察糅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马克安这个人物及其思想在纵向的历史演进与横向的学派竞争论辩当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 曾峻等著 人民出版社 2019 D25/38

本书立足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要论述和讲话精神，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因、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与各种治理力量中的定位、全面领导的主体建设、党对内部与外部各种组织及相关事务的领导、全面领导的党内法规与制度基础、全面领导的具体手段和方法、实施全面领导对执政党自身和国家发展产生的影响等维度对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建构起了完整的逻辑框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 李培林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D252/24

本书较为系统地学习、研究和论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面

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阶段特征重大变化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述、概括和精炼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学理基础、逻辑主线及方法论,指出这是党和国家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是中国发展理念的又一次重大提升,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指引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发展实践的行动指南。

《长征精神》王刚、李懋君主编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 D261.3/60:5

本书以长征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为主线,选取大量红军将士在长征中的英勇事迹和感人故事,阐述了长征精神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并结合当下社会现实论述了长征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浪漫的律令: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观念》(美)弗雷德里克·拜泽尔著 华夏出版社 2019 D516.06/12

本书介绍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背后的哲学思想。内容包括:早期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早期浪漫派与柏拉图主义传统、艺术的主权、早期德国浪漫主义中的教化概念、康德与自然哲学家等。

《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研究》石建勋著 人民出版社 2019 D668/79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总结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历史新方位;研究分析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理论意义。在此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化解社会需要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等

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战略布局 and 实现路径。

《黄金水道:长江经济带》吴传清、黄磊、万庆等编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F127.5/6

本书主要介绍了长江经济带战略出台始末和推进概况、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沿长江省市落实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实践进展、沿长江生态绿色生态廊道建设、长江航道治理和建设、综合交通网络建设、联程联运体系建设、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长江经济带现代产业廊建设、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国内外流域经济带建设比较与借鉴启示等内容。

《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夏晓虹著 东方出版社 2019 I25/697

《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三本套装。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2019年是梁启超去世90周年。夏晓虹教授是晚清及梁启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讲学。夏晓虹教授一向以产量少而精为学界及出版界认可。她是国内研究梁启超最权威的学者,研究梁启超无法绕开夏晓虹。

《往事与随想》(俄)赫尔岑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I512.55/2/3

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52年的俄国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9世纪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

(戴慧英/摘编 张雅丽/校)

聚焦学科前沿 服务教学科研

JIAO XUE CAN KAO

教学参考

2021 年第 3 期(总第 689 期)

2021 年 6 月 25 日编印

主 办: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编 印: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

排版印刷:甘肃金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730071

电 话:(0931)7768718

邮 箱:gsdxtsgckzx@126.com

印 数:1~1000 册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 456 号